



中華傳播學刊

第十七期 二〇一〇年六月

專題

「紀念Lucie——傳播教育、另類媒體、新聞史研究」

德智兼修、手腦並用：成露茜的傳播教育理念與實踐 管中祥

Lucie與我的左派辦報經驗 黃孫權

蘭嶼的另類媒體與發聲：以核廢料與國家公園反對運動為例 郭良文

記成露茜教授(1939-2010)的中國新聞史研究 夏春祥、唐志宏、李明哲

一般論文

媒體再現

企業公民與媒體報導：一個公民社會的觀點 楊意菁

性別差異政治：女性運動員的媒體再現與認同糾葛 盧沛樺、張玉佩

媒體產製面面觀

不同媒體場域的評審：以歌唱競賽節目為例 黃靖惠

我聞故我問：從對話分析取徑看廣電新聞訪問者傾聽 江靜之

論新聞讀者之「想像」：初探「記實報導」可能引發的線索 蔡琰、臧國仁

兩岸電視節目類型差異之分析：多樣化初探性研究 黃聿清、莊春發

反思傳播本質

傳播成為一門「意義科學」的想像與準備：跨符號的觀點 趙雅麗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德智兼修、手腦並用：成露茜的傳播教育理念與實踐

Bearing Virtues and Intelligence, Working with Hands and Minds-Lucie Cheng's
Ideal and Practice of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doi:10.6195/cjcr.2010.17.01

中華傳播學刊, (17), 2010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7), 2010

作者/Author：管中祥(Chung-Hsiang Kuang)

頁數/Page：3-28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0/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195/cjcr.2010.17.01>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德智兼修、手腦並用： 成露茜的傳播教育理念與實踐*

管中祥**

摘要

成露茜所想像的新聞傳播教育所培養的人才，不單是要「有學有術」，還要「德智兼修、手腦並用」，同時能夠「實踐基層、再造社會」，是個具有反省力、批判力與社會實踐力的新聞專業者。進一步來看，成露茜的傳播教育理念與實踐，不只是為了培養新世代的新聞傳播人才，更重要的是反思傳播教育與新聞媒體，以及權力者的關係。因此，在世新大學的媒體識讀課程中，以傳播權作為重要的核心概念，批判主流媒體在性別、族群、階級、年齡中弱勢群體的再現與污名，並且鼓勵進而改革媒體，讓媒體不再只是掌握在主流權力者的手中，相反的，人人都是主體，人人都是傳播者，透過另類媒體實踐，以促成社會多元發聲，實踐社會民主。

關鍵詞：成露茜、傳播教育、另類媒體、媒體識讀

* 本論文完成得感謝幾位受訪者，也謝謝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陳清河、舍我紀念館李蘭琪小姐提供資料。

** 管中祥為中正大學電訊傳播研究所暨傳播學系助理教授，E-mail: benlakuang@gmail.com。

世新大學創辦者、一生致力於新聞事業的成舍我先生，當他晚年纏綿病榻，口不能言，仍然不停地向家人索取紙筆，連續顫抖地書寫『我要說話』四字，恰是舍我先生畢生志業之寫照。有話要說的人，沒有發聲管道和工具，不能把話說出來，的確是一件痛苦的事；對嚮往民主自由的大眾，他們的痛苦是社會最大的不幸。（成露茜，2009：371）

1980年代中期開始，國家在民間社會的壓力以及新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的趨力下，開啓了自由化進程，不只是政治開放，平面與廣電媒體也逐步解禁（管中祥、張時健，2005）。1988年1月1日解除報禁，結束長達四十多年的報業控制，接著，1993年新聞局開放第一梯次中功率電台。同年，立法院通過〈有線電視法〉，並隨後於1994年開放第四家無線電視申請。雖然解除戒嚴，新聞已不再受國家檢查，但以前受到國家壓制的市場在能量解放之後，卻反過來壓抑財力較弱的新生聲音，嚴重悖離民主的理想，台灣的新自由主義國家機器與資本相互滲透，關係愈形錯綜複雜（李金銓，2003：36）。

隨著政治與媒體環境的轉變，台灣的傳播教育與外在的關係也有了變化，威權時期新聞傳播教育媒體與黨國的政治勢力密不可分，但在新自由主義的政策發展下，傳播教育與媒體產業的關係更形密切，部分學術機構開始為媒體企業培育生產人才與進行研究，傳播教育雖已脫離黨國附庸，但商業化的影響卻日益嚴重（林麗雲，2004；管中祥，2002a）。由於教育自由化，大量的傳播科系成立，導致各校競爭激烈，而採越來越強調教育的實用功能吸引學生，使得傳播教育領域，朝向技職訓練發展（陳國明，2001）。另一方面，因為傳播科技的快速變化，業者需要的人才更形多樣，傳播教育與研究機制正朝向因應新媒介變革與更細緻的分工趨勢前進（須文蔚、陳世敏，1996：24）。

台灣的媒體正處於財團壟斷、邊緣與聲音被壓抑、社會民主政治受到嚴重衝擊的窘境，新聞傳播教育則越來越受到資本主義商品化的影響，並產生系所分工過度專殊化的現象。面對此種情況，不論是傳播學術界或者民間的媒體改革團體，不僅戮力使媒體環境朝向更合理、

更公平、更多元，同時也重新思考新聞傳播教育該如何突破限制，繼續前進。

長期致力於另類教育、多元文化與另類媒體實踐的前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長成露茜，不僅主持《台灣立報》、《破報》與《四方報》等另類媒體，對新聞傳播教育的改革也身體力行，她在2004年4月公視演講廳舉辦的「2004年媒體公共論壇」中指出：「新聞專業教育正面臨一個生死關頭。在高等學府裡進行的新聞教育跟現實的情況和要求幾乎完全脫節，對媒體產業和媒體專業從業者，我們也似乎沒有任何relevance。」（成露茜，2004）。

作為社會改革與另類媒體實踐者的成露茜，對新聞媒體的發展及新聞傳播教育有什麼樣的期待與想像？她強調教育不能淪為統治者的工具，而是要培養具有批判思維、能進行社會改造和個人主體反思公民的成露茜，又會如何回應新聞傳播教育長期受到黨國及資本影響的現實？當她於2002年至2006年期間擔任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時，又如何實踐其所強調的批判性思考、另類媒體、多元文化教育等理念？為了理解上述問題，本文將透過深度訪談、文獻分析，包括爬梳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相關會議紀錄及成露茜之著作，以及親身觀察等方式探究之。

壹、成露茜對媒體壟斷的批判

媒體以新自由主義為基底的自由市場政策強調自由競爭為前提，民主的政府不該干涉市場。在此前提下，媒體一方面透過自由經營，促成意見市場的自由與多元，同時，媒體自主亦能因此監督權力者，扮演第四權的角色。換句話說，理想的情況是「媒體自由化」除意味著政治、商業等不同面向的權力者不應該且難以操控媒體；另媒體必須監督社會中各項的權力機制，並且作為公共論壇，提供不同社群思想交流與論辯空間，達到民主社會中重要的對話價值。

不過，廣電媒體開放未久，稍早前解禁的平面媒體卻已帶來了不少問題，上述的理念遇到現實的挫折。1994年，成露茜在天下雜誌的專欄，多次提及市場經濟下的資訊自由在與民主化的問題（成露茜，1994b）：

報禁黨禁開放，表面上看來似乎白色恐怖已經煙消雲散，人民可以暢所欲言，各家各派的思想、立場都有發展的空間。事實並不盡然，報界集中壟斷的局面不但沒有稍減，反而變本加厲，更為嚴重。聯合、中時兩大報挾巨大的資本和四十年累積的經驗、營造了一個畸形的發行體制；它們特殊的黨政關係，在李登輝時代之前、建立了獨家新聞的管道。

不只是傳統的兩大報在報禁開放後維持既有市場的優勢，新興的《自由時報》及《大成報》均靠同一幫派財團支持。成露茜指出，如果沒有龐大的資金和特殊的人脈關係、想生存必定比登天還難。大眾傳播從政府的控制釋放到民營，必定會移轉為財團所擁有。因此，產權高度集中的情況下，維持報紙的獨立自主性實有困難，更遑論發揮它對現有體制質疑與批判的功能。

成露茜不僅擔心所有權壟斷的問題，身為政治經濟學取徑的批判者，同時也關切媒體壟斷造成內容單一化現象（同上引）：

社會上佔優勢的族群和階級，很容易驅使媒體為他們的利益服務。有錢有權的人，往往成為媒體爭相採訪的對象，他們的意見和看法，可以得到充分的報導。

事實上，報紙除了可以是非得講求利潤的企業，也是追求理想的社會公器。民主的社會必須保障各種思想聲音都有發言的空間，同時也必須保障民眾「知」的權利，並善盡對當權者的監督與必要時的獨立批判。然而，在媒體自由化後，當一家家報紙因為惡性競爭而被強大的財團收併，形成輿論和新聞的壟斷，故台灣的民主化也就要開倒車（成露茜，1994a）。進一步來看，大眾媒體不只是大型企業，往往還是大型跨國公司的一個組成部分，新聞只是其中一項產品。然而新聞產品的功能卻是十分有用，不但自己可以替公司賺錢，還可以通過其宣傳功能幫母公司的其他產品製造利潤。

換句話說，媒介工業已逐漸地被大規模的集團所控制，媒體集團依據自己的利益和策略形塑媒介的產製方向，未必能反映社會多樣的

聲音；另一方面，傳播產業「私有化」的結果，讓文化生產操控在大企業的手中，除了產生了社會資訊不平等的現象，也窄化甚至縮緊了多元意見的出口。當媒介權力結構不平等時，媒介內容的產出也會發生失衡的情形，進而使得媒介成為政治經濟優勢者意識型態的輸送帶（管中祥，2002b）。

面對媒體壟斷的問題，作為左派的媒體教育與行動者又如何回應？

認識、反思我們所處的媒體環境與媒體對社會所造成的影響，是成露茜提出的回應方式之一。她指出，美國傳播界發起了一項「媒體生態運動」，呼籲人民注意媒體環境的品質（成露茜，1994b）。隨著國際環保意識的提升，我們日益關心自己周遭的生活環境，凡是對生活環境不利，如噪音、垃圾、廢氣及污水，影響人民視覺、聽覺、嗅覺、呼吸等身體健康的因素，無一不是我們關懷的目標。可是人民對知識、文化或影響到我精神健康的污染因素，卻很少注意。長期暴露在單一的資訊下，會使人失去批判的能力；而過量的資訊，會造成迷茫與困惑（同上引）。

成露茜點出了閱聽人需要具有自我反思的媒體識讀能力，除此之外，她也提出兩種結構改造的面向：一是 Raymond Williams、Noam Chomsky 等人倡導的另類媒體 *alternative media*；另一則是越來越多國家所施行的部分媒體公共化政策（成露茜，2004）。

成露茜指出，上述兩者在台灣都已經萌芽，對新聞教育勢必會有很大的衝擊。關於「另類媒體」議題，她強調，如果另類媒體的發展是新的媒體典範，那麼還需要所謂「新聞專業」嗎？新聞教育是否就可消失了呢？如果不是，新聞專業教育的內容會是什麼？她同時也批評媒體公共化運動雖強調公民的傳播權利，但對於公共化以後的廣播和電視台所需要的專業素養內容並沒有討論，亦未言及新聞專業要如何對待民眾「非專業」的標準。

雖然，另類媒體及媒體公共化運動的發展對台灣媒體環境的影響仍在起步，但成露茜卻已開始思考新聞傳播教育如何因應此一發展趨勢。當大部分的傳播科系著眼於媒體匯流、產業整合的因應策略時，她卻提出了有別於主流的另類教育取向，究竟成露茜對傳播教育的想像及期待為何？

貳、成露茜的傳播教育理念與實踐

成露茜於芝加哥大學求學期間修習大眾傳播課程，進行閱聽人研究，1964年獲得碩士學位，論文題目為〈中央日報和人民日報的比較〉，從新聞自由的觀點分析當時臺灣和中國政府對新聞控制的不同（錢存訓，2010）。同年回台，在台灣大學開設大眾傳播課程，半年以後，隨即赴夏威夷大學攻讀社會學，博士論文中的一章主題為夏威夷的大眾傳播。1991年接掌《台灣立報》，之後也在世新大學開設「另類媒體」和「傳播與發展」等課程。

2002年8月，成露茜擔任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在第一次召開的院會議致辭時，便開宗明義表示：「今年課程委員會的重點是推動課程改革」（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務會議，2002.09）。並指出，「新聞傳播學院是本校資格最老的學院，有一個好的傳承，秉持著公平、正義，但包袱就是在改為大學之後，分系課程沒有配合，是否我們應該重新檢討」（同上引）。不過，成露茜也提到課程改革的方向與複雜性，「牽涉必修課與課程等相關問題，可能不是一兩年可以完，但是希望今年可以開始。」（同上引）

新聞傳播學院的課程改革大致包括幾個重點：

(1) 確立新聞傳播學院的核心課程，開設「傳播理論與方法」、「傳播與文化」與「傳播技能」等院必修課。此三門課由傳播學院規劃，各系配合教學，同時授課教師成立教學小組定期討論課程，進行課綱編寫，或研發教材；^[1]

(2) 各系確立自己的核心課程，發展「學程制」，進而設立2至3學程，提供不同系所學生選修；

(3) 將「傳播與社會」改為「媒體識讀」，並作為全校必修課。

一、有學有術、回歸理論的思辨訓練

「傳統」的台灣新聞傳播教育，「傳播理論」及「研究方法」不僅是截然劃分的兩門課，同時，也是大學、碩士班，甚至是博士班的必修課。

ainiti

Lucie 在我們討論理論組跟文化組的時候，他覺得很奇怪，在台灣為什麼大學、碩士、博士每一個層級都在讀研究方法，每個層級教的都是一樣，在教學上一點都沒有區分，他覺得我們應該改變這種陋習，他認為學生們不一定是走學術研究，根本上只要知道一些方法論，就是說，為什麼要有這個方法，這個方法對這個理論來說他有什麼用。（夏春祥，訪談紀錄，2010.04.29）

「傳播理論」、「研究方法」這兩門課看似分立的課程，對成露茜而言卻是密不可分，她指出，「方法與理論，實際不能分開去談，要讓學生知道相關性」（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課程委員會議，2002.01b）。成露茜認為同樣的社會議題透過不同的取徑與方法探究，不僅可能得到不同原因或答案，並會發展出不同的理論。另一方面，不同的傳播理論也往往因其哲學典範的差異，進行社會探究時，亦採取不同的研究方法，以致於得到不同研究結果，因此，在教學上密不可分。

任何理論都不是真空中發展出來的，任何理論都是為了要回應當時的問題，你要回應問題，你一定要涉及到為什麼這個理論可以回應這個問題，我要用什麼方法才可以回應這個問題，這涉及的是邏輯的思考，不是單純的技術的訓練，可是後來……你也知道在大學的現況裡頭，量化方法跟質化方法，能夠講課講到核心精神的有限……。（夏春祥，訪談紀錄，2010.04.29）

因此，不論是傳播理論或研究方法，不能忽略其在方法論上的意義，亦即，理論與方法並非只是知識與解謎技能的訓練，而涉及面對現實社會現象之邏輯推理及思考能力的培養。「那我覺得……Lucie 這個東西（按：傳播理論與方法）是針對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是一種思考啊……。」（括號文字為研究者所加）（夏春祥，訪談紀錄，2010.04.29）

就如同成露茜所強調的：「大學生畢業要弄個研究難，重點是在怎麼看那個研究，研究與理論不能分開」（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課程委員會議，2002.01a）。就成露茜而言，研究方法與傳播理論不僅不能分開，更是思考方式的訓練，是一種如何對社會進行系統性的觀看與探究的訓練。透過既有的理論，了解理論與社會現實，以及與研究方法之間的關係，培養學生理解社會的後設能力。不過，傳統傳播教育大多未能從這樣的角度理解「傳播理論」與「研究方法」的關聯。

可是我們的方法過去教不是這樣子，我們是先選邊，你是走量化還是走質化？……在 Lucie 的思維中，題目、關懷、問題的解決、能力，這是很務實的，很直接的，是第一個面向的生活體驗。（夏春祥，訪談紀錄，2010.04.29）

除了貼近社會現實與思考訓練，如何涵養學生多元的文化思維是成露茜另一個重要的關心面向。世新大學於 91 到 94 學年度受教育部委託進行的〈提升大學基礎教育〉並於通識中心規劃「多元文化學程」，此由成露茜任主持人。該學程的核心思想奠基於下列三個多元文化論的基本批判視野「差異」、「衝突」與「共存」，並且強調「實踐文化」的教育導向，也就是日常生活的實踐。同時文化也是政治實踐的場域，因為文化差異的塑造涉及各種權力運作、價值與公義以及如何分配資源的課題。而這樣的概念也顯現在「傳播與文化」及「媒體識讀」兩項課程。

那個時候，我擔任召集人……Lucie 那時候常跟我們討論，他認為文化是需要行動的，他不用『實踐』，他是用行動，我們就叫文化行動。（同上引）

2004 年，成露茜兼任傳播研究所所長時，曾與社會發展研究所提出「文化行動派：世新大學『批判文化學程』跨所碩士班學程」，後來轉變為「媒體批判與文化行動」跨院碩／博士班學程、傳播研究所博士班主修領域。這個學程主要是將文化研究做為具有批判性問題意識和社會介入意圖的研究和實踐領域，以 (1) 接合政治經濟學的視

角；(2) 採取批判的分析取徑；以及 (3) 行動和實踐導向等共三項精神做為基本原則，並設計符合社會時勢以培養批判與實踐能力的跨院碩博士課程。冀望藉此整合世新大學跨系所的教學能量，提供延伸大學部多元文化學程的進階課程，展望形成世新大學「文化行動派」重鎮的前景。

在和成露茜與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合作開設的相關課程比起來，「傳播與文化」咱對保守許多，缺少社會行動的基進性。雖然同樣重視「行動」，但並不像多元文化學程安排「文化實習」，提供修課同學到異文化／弱勢團體蹲點的實踐式課程；或者如「批判文化學程」以行動和實踐導向以成為社會改革的「文化行動派」。「傳播與文化」而是將實踐與行動回歸到個人生活層次：「文化行動有更務實的含意，它不是那種集體性的革命，它各尋求的是個人式的昇華或解放。」（同上引）

事實上，「傳播與文化」的授課目標與「傳播理論與方法」雷同，「希望教導學生的思辯能力」（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課程委員會，2003）。同時盼擴大學子對於「傳播」議題的思考，透過課程反思自身的文化處境，並且「學習應該學到思考，用更廣泛之傳播與文化」（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課程委員會，2002.01b）。

她（按：成露茜）已經涉及到文化，不只是傳播，傳播是一個比較窄的意思，那時候她有談到一個觀點，就是……現在傳播都用非常狹窄的那種……資本主義社會裡頭那種傳播體系的概念。（括號內文字為研究者所加）（羅曉南，訪談紀錄，2010.04.29）

傳播研究受到行政研究與資本主義分工的影響，不僅學科越分越細，並且越朝實用科學與市場導向。經教學小組幾次討論後，「傳播與文化」的共同授課大綱便把課程的目的設定為：使學生能靈活運用「傳播理論與方法」課程所學到的基礎知識、對當代的社會現象提出看法，再鼓勵學生有系統地學習各種思潮，並嘗試以更廣闊的視野來檢視傳播，加強學生對於社會現象的想像與思考能力。

像是這些創意喔，你不了解一些整個思潮上的變化，你很難做應用，所以傳播理論如果是一個基礎課程，它勢必要再去討論一個更進一步的問題：這個知識如何應用……你要應用在本土上的現象的解釋，你要應用在整個世界上……整個全球化，整個社會變遷過程中……。（夏春祥，訪談紀錄，2010.04.29）

因此，課程涵蓋了多面向的文化議題，內容包括了「傳播理論與文化的研究」、「文化研究的歷史」、「文化研究的理論與方法」、「語言、符號與倫理」、「文化工業」、「公共領域」、「差異」、「視覺文化」、「消費文化」、「全球化」、「新科技」、「文化產業」、「傳播時代下的文化」與「經濟與社會生活」等單元。

雖然傳播學門中越來越受到重視「文化研究」的相關課程，不過從文化行動的思維起始，將文化研究關切的議題作為傳播學院的必修課，卻是台灣傳播教育少見的作法。

二、德智兼修、手腦並用的傳播技能

在前述公視演講廳舉辦的「2004年媒體公共論壇」中，成露茜也提到傳播教育實務專業的重要性，她指出：「任何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機構如果不教專業技術，就不配做一個傳播教育機構，但是如果只教技術，它不配做一個大學的機構。」（成露茜，2004）。世新大學創辦人成舍我在創校伊始，即將「德智兼修、手腦並用」訂為校訓，將「理論與實務並重、以實務驗證理論」訂為教學方針。這樣的理念強調新聞記者，除了要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良好操守與道德勇氣，還必須具備聰慧的頭腦以及劍及履及的勤勞習慣。「德智兼修、手腦並用」的理念不僅與成露茜創立社會發展研究所「有學有術」的辦學理念相契，並且在她擔任院長期間召開的會議中多次被提及。因此，除了偏向思考訓練與反思現實的「傳播理論與方法」及「傳播與文化」外，另一門同樣由新聞傳播學院進行規劃，強調「手腦並用」、「有學有術」的「傳播技能」便是以實務訓練為主。

「傳播技能」為一學年課程，由院內各系各負責八小時實務教學，

修完六小時課程舉辦小型成果展，學生某系技能課程後，再修習它系課程，最後統合各項習得技能於學年末舉辦全校性成果展。

以新聞系為例……第一堂課就是教採訪，第二堂課教編輯，就是下標題的這個部分，第三堂課教的是排版，第四堂課就是成果展現，學生每個人都要做出一份報紙。（廖雲章，訪談紀錄，2010.04.26）

雖然，學生只有八小時學習一個系的專業課程，但一年下來也能初步理解傳播學院各系的實務工作。事實上，近幾年隨著大學教育商品化的趨力，以及在新傳播科技影響下，傳播科系不僅越來越實務導向，系所的分類也越來越專殊化，不少傳播科系也為因應新興科技而增設系所（陳世敏、須文蔚，1996：15）。以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為例，就有新聞、廣電、公關暨廣告、口語傳播、圖文傳播暨出版、傳播管理、數位多媒體、資訊傳播等八個科系。但這樣的分工卻也使得學生往往只學到自己的專業技能，對整體媒體實務較難有全觀性的理解。

他看過去的課程規劃跟設計，他覺得說，沒有一個整體感，就是……可能之前大家就是各自做各自的……。（廖雲章，訪談紀錄，2010.04.26）

他那個時候的思考，就覺得分工分得太細了……如果你的專業技能都分到那麼細，那你將來要培養一個比較健全型的新聞人，那根本就是不可思議……。（羅曉南，訪談紀錄，2010.04.29）

傳播科技日新月異，但媒體整合也在同步進行，傳播科系發展專業化的同時，亦不能忽略整合與多元能力的培養。換句話說，傳播教育必須因應時代而改變，包括適應資訊科技匯流趨勢，加強學跨媒體表達能力，訓練學生如何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陳韜文，1999：140）。面對這樣的發展，成露茜在院課程會議時便指出，

媒體現在作整合，未來會要求對不同媒體寫稿，這種能力是傳播學院學生必須要有的能力，例如，在北京廣播學院就有一句口號：口頭、筆頭、鏡頭訓練學生。（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課程委員會議，2002.01a）

換句話說，「業界希望一個人能有好幾種能力，現在記者是要求很多能力。」。（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課程委員會議，2002a）

Lucie 他觀察到未來的整個整合的趨勢，你不能只有一種技能，然後你完全不理解別人在做什麼。所以就算你是新聞系，你要知道廣電是怎麼回事，知道數媒（按：數位多媒體學系）是怎麼回事，因為有一天你有可能會需要跟這樣的人合作……。（廖雲章，訪談紀錄，2010.04.26）

專業分工雖然有專業的學習，但若僅侷限在自己的專業技能，不僅可能忽略人文的視野，也難以用宏觀的角度觀看專業的發展。世新大學發軔自技職教育開始，從高職、專科、學院到大學，雖然以傳播專業聞名，造就不少專業人才，不論是外界或世新大學本身都非常強調技術與技能。但成露茜認為，「好聽一點是說你可以學得很專業，但難聽就是你會變得視野很狹隘，你只看見你自己這一塊。」（同上引）。

不可否認的是，八小時的課程對學習者而言，自然難以透徹與完整學習其它科系的專業技能，但作為一位傳播領域的新生，卻有機會認識其它專業技能的基本知識，也可望進而對於傳播工作有更廣泛的認識。

就算你不懂，你不是那麼清楚，可是你可以掌握一些基本的基礎，你可以知道別人在做什麼，對於理解跟拉高你自己的傳播的視野是有幫助的……。（同上引）

廖雲章以「作椅子」比喻傳播技能課程的重要性，她認為傳統傳播技術的學習，就好比訓練學生堅持作好一張椅子，但卻不在乎這椅子得如何搭配桌子或使用者的需求。不過 Lucie 有不同看法：

Lucie 會比較希望學生，你也做一下椅子，你也做一下桌子，也學一下室內設計，那你可以用一個比較整體的角度來看你要怎麼樣設計這個房間…可是你可能不用一開始就把椅子做的很好，把桌子做的很好，但你要知道每樣東西大概是怎麼做的。（同上引）

把「傳播技能」開設為大一全院必修課，除了能讓同學在大一對各系的專業有初步了解、對傳播工作有整體的認識外，這門課也像是各系的展示「櫥窗」。學生對專業技能有了基本的理解後，大二時便能依自己的興趣，選擇各系開設的學程。

她同時也發現很多世新的同學在進來之前，他對這個系是沒有認識跟想像，也許會轉系或者是有些其他的考量……那傳播技能希望讓同學可以有機會重新認識整個傳播學院的分工……而學程就是鼓勵同學，你如果對這個東西有興趣，那你就再去選這個系的學程。（同上引）

「學程」是成露茜擔任院長後，對於各系課程改革的重大變革。一方希望藉此找出各系的核心能力，依核心能力設立不同的學程；另一方面讓同學到大二後，除了修本系的必修與學程外，也能透過選修學他系的學程以習得不一樣的專業技能。因此，在其擔任院長後的第一次院課程委員會就作了如下宣示：

我們的學程是重新思考，整合我們的課程……各系可以自行討論如何整合，如何作一個 package，老師們可以設計學程……這些的範圍是很廣的，希望新聞傳播學院的課程，是可以與時俱進。（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課程委員會議，2002.10）

經過多次討論後，各系發展 2-3 個學程，這樣的作法雖然造成各系的課程「大地震」，執行時也遭遇排課的困難，但卻也讓各系再次確認自己的核心能力、同時挑戰既有的科系分工，學生也能有多元的學習。

不論是偏重思維訓練及理解社會現實的「傳播理論與方法」、「傳播與文化」或重視實務訓練的「傳播技能」，這些由院主導的課程都是回應既有的媒體與學術環境，試圖建立新的學習方式。相對於由院主導課程的「立」，同樣由成露茜大力推動、新聞傳播學院教師為教學主體的全校必修課「媒體識讀」，則是扮演「破」的角色——打破媒體塑造的權威神話。

三、行動與實踐的媒體識讀教育

新自由主義強調媒體自由市場，媒體經營由利潤與市場來決定，故將資訊、內容商品，將閱聽眾當作消費者，經營目的在於刺激消費者購買以獲得利潤。不過，在此種目的下，媒體內容卻未必朝向更好品質與更多元內容生產，有時反倒只求降低成本、競逐腥羶色內容，以換取收視率與廣告收入。許多國家為了能讓閱聽眾能自主的選擇資訊，不受媒介欺騙與左右，紛紛設立「媒體識讀」^[2]（media literacy）課程，讓閱聽眾具有解讀文本、產製媒介資訊與文化生產的能力。課程目標是要將「媒體識讀」課程置於公民教育與生活之中，除了培育基本的媒體素養外，更重要的是要突顯閱聽眾的「公民」身份，而非只是單純的「消費者」（管中祥，2003）。除了民間率先推動，政治大學也於 2000 年開設「媒體素養概論」非同步網路教學課程，同年世新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也開「媒體識讀」課程，隔年納入教育部「提升大學基礎教育」計劃，並增設網路教學。

我在 UCLA 接觸『媒體識讀』，一直覺得這門課很重要，可以培養學生成為自主思考的閱聽人。回來以後，才知道通識中心已經開設這門課程。傳播學院除了培養媒體工作者外，還要養成學生，使成為具有自主性的閱聽人。（世新大學媒體識讀教學小組，2003.07）

世新大學原設有「傳播與社會」的必修課，內容偏重引進不同媒體之運作與相關傳播學理，至於媒體與人（社會）之關聯或批判性的見解等則少有闡述（羅曉南，2005）。而成露茜擔任傳播學院院長後，接合原有通識中心開設的「媒體識讀」，於92學年度成爲全校必修課，同時召集傳播學院教師投入，組成教學小組，進行教學研討並編撰共同教科書《批判的媒體識讀》^[3]。

這本書的書名就揭示了世新大學媒體識讀教育的特殊與重要性，雖然，近幾年包括政大、世新、國北師、慈濟、南華、陽明、逢甲、台大、師大都開設相關課程，也有多本媒體識讀／素養爲題目的教科書出版，但顯少直接表明其批判與實踐的立場。之所以以「批判」爲名，除藉以區隔名稱相似但有內涵有別的其它的論述，更是爲了突顯世新大學媒體識教育強調的批判和實踐取向（成露茜，2005）。而「批判」一詞，特別是希望強調其中蘊含的自我批判／反思之意涵，意即，「批判」並非一味的指責對方／他人，而是要將自己與批判對象視爲一體，也唯有「閱聽人與傳媒一體」，共同思辨當前的媒體問題，並承擔革新任務（羅曉南，2005）。

批判的重要意義在於「反思」，反思自身處境與社會關係，及其限制性的種種結構因素，並進而透過培力採取行動策略。換句話說，批判並不只是「坐而言」，更重要的是「起而行」。例如，成露茜就在該書的序言中指出，

《批判的媒體識讀》的終極目標不僅僅在於辨識解讀資訊，而是期待媒體環境的改善，這是爲什麼我們在每一章的結都會有一個〈思考與行動〉的方塊，希望本書的使用者能「起而行」，從個人的日常生活出發，以社會公義為準則，個別的、集體的、運用多樣的策略與方法監督媒體，維繫我們作為公民應有的傳播權利。（成露茜，2009：3）

而這也是成露茜強調的「有學有術、實踐基層、回歸理論、再造社會」的實踐精神。

2009年版的《批判的媒體識讀》，大致延續2004年、2005年版的架構與內容。分成媒體識讀的基礎、媒體產製、文本類型與解讀、意識型態與再現、行動閱聽人。除了媒體相關的基本概念外，本書更強調對媒體文本及其意識型態的批判性解讀，並涉及到文本背後之社會權力與控制關係的批判，以及相關之行動建構等問題。同時涵蓋「再現政治」、另類媒體生產，和擴大批判性之文本分析範圍，以包括對其社會語境和權力宰制等問題的分析，亦即，這種批判性取徑的媒體識讀特別強調了，多數媒體教育所忽略的對意識型態、權力和統治這三者間關聯性的理解，也就是說，它也對當前主流媒體識讀教育和其民主／社會變革之政治計畫的不足，提出了批判（羅曉南，2009：12）。

譬如我們很重視對政經結構的思考、對媒體組織的思考，我們會探討誰有權、誰獲利，這種思考其實就是很典型的政治經濟學。（余陽洲，訪談紀錄，2010.04.26）

傳播政治經濟學分析社會關係與權力的運作，並且關心社會關係中不對稱的結構，如何影響意義的製造與使用。換句話說，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可視為各種社會關係（特別是權力關係）如何相互構成，以致影響了資源的生產、分配與消費（Mosco, 1996 / 馮建三、程宗明譯，1998：112-113）。

在資本主義社會裡，除了極少數以外，媒體大多是私有產業。在資本主義還沒有很發達的時候，媒體，主要是報紙，還是小企業，隨然也追求利潤，要求不高，廣告主也不是大企業，力量有限，不到能夠影響媒體、左右新聞報導的地步。但在廿一世紀的今天，大眾媒體本身是一個大型企業還不說，而往往是大型跨國公司的一個組成部分，公司多角化經營，新聞只是其中一項產品。這個產品十分有用，它不但自己可以替公司賺錢，還可以通過它的宣傳功能幫這個公司的其他產品製造利潤。在這樣的結構下，媒體對廣告主的依賴最自然。（成露茜，2004）

成露茜對媒體權力的關切也反應在媒體識讀教育中，她在《批判的媒體識讀》之〈媒體產製篇〉的導言指出，媒體所呈現的內容是製造出來的，而非自然的或具體事實的客觀反映；而國家的政策、利潤的追求、社會公益的考量、媒體工作者的環境等都會影響媒體的產製，而產製過程又受到整體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所制約（成露茜，2009）。成露茜所關切的不只是媒體文本的生產過程，更重視影響生產的社會關係與權力機制的複雜關係，因此，不僅書中不僅呈現了電影、電視、新聞等不同媒體產業結構的影響因素，也關切媒體勞動者在此結構下的處境限制與突破之道。

事實上，傳播媒體原有公共特質在商業化後徹底被顛覆了，由於商業化以及在經濟、技術和組織的一體化，傳媒變成了各種優勢權力的角逐場所，使其重新集中在商業交換的私人領域，排擠了一般民眾的見進入公共領域的機會（Habermas, 1962/1989: 222-224）。不僅如此，失去媒體權力者往往喪失公共領域自我定義權，落入到「被忽略」、「被定義」窘境。媒體再現是媒體識讀教育關心的重要面向，然而再現不只是涉及到媒體呈現了什麼樣的文本，更重要的文本背後的意識型態，以及如何造成再現與被再現的權力問題。和其它媒體識讀教材不同的是，《批判的媒體識讀》特別強調階級、種族、性別、年齡等四個重要的媒體再現面向。

這四類群體的弱勢處境不僅是成露茜長期關切的議題，也和其擔任主持人的「多元文化學程」所強調的一致。「多元文化學程」除了「核心課程」、並設有「性別學群」、「族群與國族學群」、「階級學群」、「年齡學群」等課程類別，多元文化學程的理念是以批判和反省為核心，而非僅是文化多樣性的並存。人類的文化自始就非單一，而有多種源流和展現方式；但是過去強調定於一尊，壓抑了多元異質的聲音。事實上，這樣的現實也反應在媒體再現的文本中。其所涉及的不只是媒體再現了什麼，而是如何再現，以及影響再現的權力機制。

強調行動與實踐的成露茜自然不會認同與接受這樣的權力現實，對傳播政治經濟學而言，「實踐」不只是個概念，而且是個使命，不只是用以區別和其它秉持中立者的差異立場，更是具備道德哲學的現

世參與。就一般層次的意義來說，「實踐」指的是人類的生活；就特殊意義而言，實踐指的是人類的自由與創造活動，人類以此生產及改變世界與他們自己（Mosco, 1996 / 馮建三、程宗明譯，1998：59-60）。也因此，面對這樣的媒體結構，不僅是要讓閱聽人從媒體文本及意識型態解放，成為具自主性的耳聰目明閱讀人，更重要的是，進而成為具有行動力的媒體公民，改善既有不合理的處境。因此，成露茜在〈行動閱聽人篇〉的序言中明確宣示：世新大學的媒體識教育的終極關懷是從「批判的媒體識讀」的意識主張，進而發展為「媒體識讀的批判」的社會實踐。而「批判」是強調自我省思與作為，「從生活出發」、「從作中學」的核心概念，藉由激發閱聽人的權利意識、公民意識乃致行動的賦權（成露茜，2009）。

為了強化這樣的目的，2009年出版的《批判的媒體識讀》，將原本在〈行動閱聽人〉篇下的〈閱聽人傳播權〉篇章，改置於「媒體識讀的基礎」單元之下，成露茜強調，這是將傳播權視基礎概念，應該先被理解，而「行動閱聽人」則為最後的社會實踐（成露茜，2009）。「行動閱聽人」不僅將傳播權視為核心理論與理念，介紹台灣不同類型的媒體改革運動，更重要的是以實際案例（包括世新大學學生曾採取的各項行動），提供個人或集體抗議媒體的經驗與作法；並授課教師也經常鼓勵學生投書表達意見，或採取實際行動向媒體抗議。這樣作的目的是希望培養具體實踐力之主動閱聽人及成熟公民，通過媒體識讀教育之「增權」，不僅有助於主流媒體所邊緣化或錯誤再現的閱聽眾，述說他們自己的故事和表其自我關切的機會；而且，批判的媒體識讀也給統治團體的成員提供了更多元／另類的對社會真實的體驗（羅曉南，2009：12）。

其實，我們書的最後一章就是講另類媒體，那個就很清楚，她（成露茜）把自己放在最後一個，有種導引的味道……另類媒體你要放到那個整個環節來啊，譬如說他講邊緣少數，邊緣少數其實他重視就是多元發聲。（羅曉南，訪談紀錄，2010.04.29）

《批判的媒體識讀》的第四篇〈意識型態與再現〉分析了性別、年齡、種族、階級中弱勢群體如何遭到媒體權力者扭曲與污名的現實，第五篇〈行動閱聽人〉則試圖提出反制與改革策略。而最後一個單元，也是本書的最後一章是則由成露茜所執筆的〈另類媒體〉作為整本書的結束。成露茜在本章的開始就回顧與再次聲明《批判的媒體識讀》的主要目的，她指出：

媒體識讀一般是針對大眾傳播的內容進行批判性的分析，指出它明白顯示的或隱藏的政治、社會意涵，並且試圖從媒體的擁有、內部組織、內容生產過程，乃至於所鑲嵌在內的整個政經文化體系來理解這種內容產生的原因和後果。（成露茜、羅曉南主編，2005：371）

她以原住民族為例，原住民偶爾出現在媒體時，往往只強化一般民眾對他們的刻板印象，透過媒體識讀幫助閱聽人去理解他們從一般媒體上接收的訊息，探究媒體這些選擇性和歧視性的報導的根源，並以行動促使改革。不過，除了採取回應媒體的行動外，成露茜還特強調：

不要忘記，除了一般大眾媒體之外，還有別的媒體也在生產和公開傳播訊息，而它們所傳播的訊息與大眾媒體截然不同，學者稱這些媒體為『另類媒體』（Alternative Media）。（成露茜，2009：371-372）

雖然世新大學媒體識讀教育鼓勵學生透過讀者投書等方式落實近用媒體的傳播權，不過，成露茜很清楚知道此種作法的侷限性。她在1994年發表於《天下雜誌》的專欄文章〈資訊自由與資訊污染〉中談到當時的地下電台現象時，便清楚指出：

一般民眾很難獲得媒體的青睞。尤其是不容放主流的『另類』、弱勢團體及升斗小民。這些人的意見，如果不是以很聳動或激烈的表達方式，而得到負面的報導，最多只能在『讀者投書』、

『聽眾回響』等十分局限的版面或時間中出現。在最有影響力的無線電視上，絕少有邊緣的聲音及影像，若有，也是扭曲或片面的。（成露茜，1994b）

不過，隨著科技發展、硬體設備相對低廉化和教育知識多元化，使一些「另類」開始也有能力從事「小眾」傳播。她肯定當時的另類媒體「台灣地下電台的出現，和在群眾中產生的影響，反映了社會對資訊進一步自由化的要求，和平等使用傳播工具的權利」（同上引）。因為這樣的信念，故《批判的媒體識讀》文末以另類媒體結束，也作為新的開始，透過另類媒體成為整合弱勢的、非主流的、非商業邏輯的發聲管道，提供草根的、異議的觀點與社會動員的平台（成露茜，2009）。

參、結論：另類教育培養主體公民

新聞傳播教育該如何教是近二十年來傳播學術社群關切的重大的議題之一，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教授陳韜文在《新聞學研究》中提到，傳播教育的基本目的在提升學生思考分析的能力、特定範疇的知識，以及用各種媒介表達自己的能力（陳韜文，1999：138）。但更早之前，便有許多學者對於傳播教育越來分殊化、強調實用取向的現象提出解決之道（須文蔚、陳世敏，1996：26）。

成露茜不只是理論者，更是實踐者，不只「坐而言」，更是「起而行」，2002年至2006年擔任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期間，延續成舍我先生創辦世新的理念，透過具體的策略與行動企圖回應傳播教育所面臨的問題。她指出，「新聞教育跟現實的情況幾乎完全脫節」（成露茜，2004），新聞傳播教育不能只諸如談客觀中立的規範性原則，而是要有能力回應社會現實，成露茜也強調新聞專業訓練的重要性，「認為任何大學的新聞傳播教育機構如果不教專業技術，就不配做一個傳播教育機構，但是如果只教技術，它不配做一個大學的機構」（同上引）。不只如此，除了新聞專業，「我們的新聞教育必需培養不僅有新聞專業技術的人，這些人必需能對他們的專業有檢討、反思、批判、改造的能力和動力」（同上引）。成露茜

所想像的新聞傳播教育所培養的人才，不單是要「有學有術」，還要「德智兼修、手腦並用」，同時能夠「實踐基層、再造社會」，是個具有反省力、批判力與社會實踐力的新聞專業者。也因此，以院主導的課程「傳播技能」希望重整分殊化的實務學習，擁有多樣性的傳播技能，同時對實務操作也能較全觀的了解；「傳播理論與方法」則是打破傳統傳播教育將理論與方法二分的思維，培養學生面對現實社會現象的邏輯推理及思考能力；而「傳播與文化」則是希望擴大學生對「傳播」的想像，有系統地學習各種思潮，以更廣闊的視野來檢視傳播現象。

進一步來看，成露茜的傳播教育理念與實踐，不只是為了培養新世代的新聞傳播人才，更重要的是反思傳播教育與新聞媒體，以及權力者的關係。在一篇〈多元文化與教育〉的文章中提出：教育與文化的關係，一直存在兩個相互對立的觀點（成露茜、張正，2006：625）。一方認為，教育是統治者通過選擇性的文化傳承，藉以進行社會控制的重要機制；另一方則認為，教育這個場域，是為了培養具有批判思維、能進行社會改造和個人主體反思的公民（同上引）。前者所強調的是，教育作為社會整合與文化延續的功能；被稱為「另類教育」的後者則挑戰這種認知，強調教育不能淪為統治者的工具，而必須「賦權」予被統治者（同上引）。

新聞媒體不論是作為第四權或公共領域，都被期待必須實踐監督權力者及多元發聲的角色。雖然新聞媒體被賦予與權力者某種對立關係的角色，長期受到政治及商業影響的媒體實務及新聞教育若缺乏反思，將可能淪為 Althusser（1971）所批判的「意識型態國家機器」，成為社會控制的教育機制。相反的，成露茜強調另類媒體實踐，希望能透過另類教育推廣批判思維、強調「賦權」予人民，鼓勵弱勢發聲，甚至鼓勵與統治者對抗。

成露茜所關切的，不只是媒體專業者的養成，更是當代民主社會中，「人」的教育與培力，試圖透過全校必修的「媒體識讀」課程，作為一般民眾重要的賦權／培力，實踐上述的理念。對她而言，「傳播」不只是一種專業技能，更需回歸到「溝通」（communication）的本質，是一種多元再現、相互理解的重要過程，也是民主政治的重要

基礎。事實上，當代媒體已和人民權力及民主政治的發展密不可分，閱聽眾不僅要有識讀媒體的基本能力，更重要的是，讓人從主流媒體與政治所形構的意識型態中解放出來。因此，在世新大學的「媒體識讀」課程中，以傳播權作為重要的核心概念，批判主流媒體在性別、族群、階級、年齡中弱勢群體的再現與污名，並且鼓勵進而改革媒體，讓媒體不再只是掌握在權力的手中。人人都是主體，人人都是傳播者，透過另類媒體實踐，以促成社會多元發聲，實踐社會民主。

事實上，成露茜在推動新聞傳播教育改革時便面臨不少質疑與限制，但改革的步伐仍能緩慢前進，然而，而在卸任新聞傳播學院院長後，許多課程則遭到調整。這些改變包括「媒體識讀」從一學年課程減縮為一學期，也因此，許多需要深入討論的概念及具體行動的課程勢必會面臨到取捨；原本要求靜態展出與大禮堂的動態展演，並且企畫宣傳、多樣化呈現的「傳播技能」課程成果展，改成只需要影片上傳，學生實際操作多樣及整合性技能的實踐機會也會到影響；而打破理論與方法分離的「傳播理論與方法」則改為「傳播理論」與「研究方法」兩門課，未來學生如何了解理論與方法間的辨証關係？如何回應當代重要議題？也需要在課程上重新思考。諸多原本成露茜規劃及具體實踐，植基於「德智兼修」、「手腦並用」的傳播教育理念已面臨到極大挑戰，甚至也有人認為是挫敗。即使如此，成露茜的改革行動仍為新聞傳播教育規劃出論辯與實踐的方向。

註釋

- [1] 除上述三門課外，尚有另一門全院必修課——「資訊素養」，由資訊傳播學系負責規劃，訓練學生資料蒐集與分析能力，該課與本文要旨較無關連，並且非由新聞傳播學院以 teaching group 主導的課程，因此，本文將不作進一步討論。
- [2] Media literacy 一詞在台灣有不同的翻譯方式，分別有「媒體（介）素養」、「媒體識讀」、「媒體公民教育」。
- [3] 本書原名為：《媒體識讀——一個批判性的開始》，後經內容調整、改版後，更名為《批判的媒體識讀》。

附錄：訪談名單

姓名	職稱	訪談時間	訪談地點
廖雲章	世新大學「傳播技能課程」教師、台灣立報副總編	2010.04.26	新聞傳播學院辦公室
余陽洲	世新大學「媒體識讀課程」教師、媒體識讀教學小組成員	2010.04.26	余陽洲教授辦公室
夏春祥	世新大學「傳播與文化課程」教學小組召集人	2010.04.30	夏春祥教授辦公室
羅曉南	世新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前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媒體識讀課程」教師、媒體識讀教學小組成員	2010.04.30	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辦公室

參考書目

-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課程委員會（2002.01a）。九十一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六次會議紀錄，台北市。
-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課程委員會（2002.01b）。九十一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七次會議紀錄，台北市。
-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課程委員會（2002.09）。九十一學年第一學期第一次會議紀錄，台北市。
- 世新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課程委員會（2003.11）。九十二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會議紀錄，台北市。
- 世新大學媒體識讀教學小組（2003.07）。第二次會議紀錄，台北市。
- 成嘉玲（2010）。〈董事長的話：繼續奮進 永保卓越成就〉。上網日期：2010年4月27日，取自 http://www.shu.edu.tw/about/about_5.htm
- 成露茜（1994a）。〈「自立」易手之後〉，《天下雜誌》，159。上網日期：2010年4月10日，取自 <http://www.luciememory.org/420>
- 成露茜（1994b）。〈資訊自由與資訊污染〉，《天下雜誌》，162。上網日期：2010年4月10日，取自 <http://www.luciememory.org/420>
- 成露茜（2004）。〈全球都在尋找新聞工作者典範〉，《破報》復刊號。上網日期：2010年4月16日，取自 <http://pots.tw/node/4257>
- 成露茜（2005）。〈序言〉，成露茜、羅曉南（主編）《批判的媒體識讀》，台北市：正中。
- 成露茜（2009）。〈媒體產製〉，成露茜、羅曉南（主編）《批判的媒體識讀》，第二版，台北市：正中。
- 成露茜（2009）。〈再版、初版與我們的希望〉，成露茜、羅曉南（主編）《批判的媒體識讀》，第二版，台北市：正中。
- 成露茜（2009）。〈行動閱聽人〉，成露茜、羅曉南（主編）《批判的媒體識讀》，第二版，台北市：正中。
- 成露茜、張正（2006）。〈教育與文化〉，《世新大學反思多元文化（試教本）》，未出版。
- 李金銓（2004）。《超越西方霸權——傳媒與文化中國的現代性》，香港：牛津。

- 林麗雲 (2004)。《台灣傳播研究史》。台北市：巨流。
- 馮建三、程宗明譯 (1998)。《傳播政治經濟學——再思考與再更新》。台北市：五南，（原書 Moscow, V. [1996].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Rethinking and renewal*. Thousand Oaks, CA: Sage.）
- 陳國明 (2001)。〈回歸人本的傳播學教育〉，《傳播研究簡訊》，25：15-17。
- 陳韜文 (1999)。〈傳播教育的知識結構問題：思考分析與實務技術訓練之間的張力〉，《新聞學研究》，59：137-141。
- 須文蔚、陳世敏 (1996)。〈傳播學發展現況〉，《新聞學研究》，53：9-38。
- 管中祥 (2002a)。〈「國民黨國機器」操控媒介資訊形式的轉變 (1924-1999)〉，《傳播與文化》，9：163-201。
- 管中祥 (2002b)。〈從 Habermas 的溝通觀再思考媒體傳播過程的權力意義〉，《中華傳播學刊》，2：188-222。
- 管中祥、張時健 (2005)。〈新自由主義下的台灣媒體反對運動〉，《台灣史料研究》，24：22-54。
- 錢存訓 (2010)。〈紀念露茜〉。上網日期：2010 年 4 月 28 日，取自 <http://www.luciememory.org/449>
- 羅曉南 (2005)。〈羅序〉，成露茜、羅曉南 (編)《批判的媒體識讀》，頁 vi。台北市：正中。
- 羅曉南 (2009)。〈導論〉，成露茜、羅曉南 (編)《批判的媒體識讀》，頁 7-16。第二版。台北市：正中。
- Althusser, L. (1971). Ideology and ideology state apparatuses. In T. Eagleton (Ed.),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 (pp. 170-186). London: New Left Book.
- Habermas, J. (1962/1989). *The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B. Thomas, Tran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Bearing Virtues and Intelligence, Working with Hands and Minds -- Lucie Cheng's Ideal and Practice of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Chung-Hsiang Kuang*

Abstract

Lucie Cheng maintained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have characterized journalists: (1) reflection, criticism, and social practice; (2) combining academic knowledge with learning skills, morality with intelligence, as well as hands and minds working together; and (3) praxis in grassroots movements and rebuilding of our society. Lucie Cheng believed that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should be designed to do more than cultivate a new generation of journalists.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the news media, and the people in power. Media courses offered in Shih Hsin University treat communication as a core value. The university criticizes the stigmas of minorities represented in the mainstream media, gender, race, class, and age. These courses function to reform media to empower journalists to communicate through an alternative media in order to promote diverse voices as well as realize social democracy.

Keywords: alternative media, Lucie Cheng, communication education, media literacy

*Chung-Hsiang Kuang is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Chiayi, Taiwan.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Lucie與我的左派辦報經驗

Lucie and Our "Leftist" Experiences to Making News

doi:10.6195/cjcr.2010.17.02

中華傳播學刊, (17), 2010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7), 2010

作者/Author：黃孫權(Sun-Quan Huang)

頁數/Page：29-41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0/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195/cjcr.2010.17.02>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Lucie 與我的左派辦報經驗^{*}

黃孫權^{**}

摘要

本文以回顧的方式，記錄了一段我與成露茜博士在台灣立報社相處學習的經驗。這些經驗呈現了某些我們對於「另類媒體」實踐後的思考，希望提出一個更為寬廣的，與社會辯證的取向來重新框架媒體與另類的關係，這種源於實踐所產生的視野與想像，我認為是對成露茜博士最好的致意與懷念，也是她帶給台灣最重要思想遺產之一。

關鍵詞：成露茜、破報、台灣立報社、另類媒體

^{*} 本文原發表於《破報》復刊號 598 期，並刊登於《傳記文學》2010 年三月號，本文特別補充了關於兩篇國外學者對於另類媒體與主流媒體的看法，以及我與成露茜博士在世新開課的經驗，並拿掉一些較為個人感覺與激動之處。

^{**} 黃孫權為破週報總編輯，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所助理教授，E-mail: intertiaism@gmail.com。

另類媒體最大的原則，就是以推動社會整體進步為目標的，而非自我保存。也就是說，這個媒體，一個另類媒體自己是不是能夠存活，這個對它來講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們大家可以想像，如果不以自己的存活為最重要的考慮的時候，其實你是非常的解放的，有很大的空間，因此它需要的資本很低。它認為智慧財產權基本上是公共財，反對它的私有化的，它自己也開放智慧財產權，也就是別的人也可以用它的東西。他主張DIY，作自己的媒體唱自己的歌。它去制度化，讀者也是作者，任何人都可以作媒體，所以它是多元的，它不要反應社會上已經有很大聲音的人的意見，而是給還沒有發聲的許許多多的人，讓它用自己的形式去發聲。（成露茜，公共電視《媒體公共論壇》發言記錄，2004）^[1]

壹、合作／民主編輯台

1994年，我還是台大的小研究生，到《台灣立報》當半職記者賺取學費，那時《台灣立報》是台灣令我最驚奇的報紙，政治版每天罵著李總統批評時政，社會版則涵蓋各式社會運動的報導，從原住民運到勞工運動幾乎無役不與，而專版中心則有全台灣第一個新兩性（關心性別議題）、新世族（關心學院與知識份子處境）、銀髮族（關心老人議題）、走調文化（關心另類、地下的文化事件）的版面，一堆奇形怪狀的年輕人與老左主管融洽但吵鬧的相處著。

那時後，專版中心的同仁正進行一個新的實驗計畫，想要打破記者原來的分線。有一些基本的問題被反覆提出，例如：如何讓喜歡 The Smiths^[2] 的年輕朋友也尊重同志之愛？愛聽 Tom Waits^[3] 的年輕人如何可能參與勞工運動？記者的分線工作豈不原子化自己，無法掌握整體台灣社會的變動？這些現在看來仍樸素熱情有點幼稚的想像是當初的我們終日縈繞的思考。

我們決定打破既有分線，每週末集體討論，共同製作，每個人可以自提題目，經共同討論後執行，無所謂分線與派線，這種集體討論的氛圍一直延續至今，也成為《破報》編輯台的主要風格。在週末出

版八個版的綜合文化新聞，有學運刊物那種手繪貼版風格，惡搞，基進，實驗，幾乎無惡不作，充滿了熱情與青年過剩的氣血，謂之破。Lucie^[4] 很滿意「破報」的名字，「有破有立」便成為她朗朗上口，報社的精神標竿。POTS 更是 POT（美大麻口語用法）的變態復數型，與「破」也諧音。這是美好的 1994 年，地下文化浮現：春天的吶喊、搖滾破爛生活節、國際後工業噪音藝術節、女性影展、台灣第一個戶外瑞舞派對（rave party）都在此年誕生，學運從狹義的政治路線走向更為寬廣文化行動。這也是 Lucie 從美國回台後，每年一半時間在 UCLA 教書，一半的時間與我們一起工作的美好時光。

她總是很優雅看著，聽著，並容忍我們與《立報》那些值得敬佩的老同事之間的衝突，這些衝突從服裝穿著到上班時說話的音量，從標題到排版的風格，從新聞的專業到文化的衝突都有。同年，這位優雅的女士在台大城鄉所開課，於是我又變成她的學生，從碩士到博士，她一直都是我的口試委員。她不像其他老師總給厚厚的讀本，厚到我們懷疑老師自己有沒有唸過，她也不說教，花非常多時間聆聽，然後發問，總是問得我們結舌。

半年後，那時專版中心主任小蔡（蔡建仁）要年輕人自立自強，我接任專版中心主任。1995 年，我們隨即向 Lucie 提出了要獨立出刊的計畫。Lucie 最欣賞的熱情掩飾了我們這群年輕人的粗魯莽撞與幾乎沒有計畫的計畫，在當年 9 月 3 日浩蕩出刊，隨即贏得不少聲譽。每一次的專題都是一場戰爭，與社內與社外的，每一次的專題都有 Lucie 所言的：「要平衡全台灣的媒體」的氣度。我們召集了一流的好手，採取一如 Lucie 在美國主持亞美研究中心一樣的共同決策制，共同在編輯台上決定事情，沒有人可以單獨決定題材，所以常常一個編輯會議可以從晚上四點開到隔日的太陽升起，猶如一場提前開始的狂野派對。當時《台灣立報》的社會組是《破報》的戰友，雖然我們常常互相跨線，但基本上，他們處理社會運動以及其文化效果，我們則處理文化運動的社會性效果。

1997 年，Lucie 創立社發所。台灣立報社面臨嚴重虧損，學校的預算減至一半。Lucie 任台灣立報社長從未支薪，即便在《破報》曲高和寡的情形下，她也只溫柔的對我說「資本主義汪洋裡沒有社會主義的

島嶼」，要我多想想《破報》的經營模式。最終在七月，《台灣立報》面臨了一次大裁員。那也許是 Lucie 一輩子中笑容沒那麼燦爛的時候了，每次工作完陪她走回住處（我們總是要趕她回家，否則不曉得她會工作到幾時），她總是笑笑著問：「孫權，你有沒有想法啊？」

之後，Lucie 思考台灣立報發展成教育專業報的可能，而我則暫代《立報》新成立的教育組組長，我們一起思考與研究如何可能。期間，我提出了《破報》復刊的計畫，以紐約《村聲》（The Village Voice）雜誌為範本，創辦台灣第一份免費資訊報。Lucie 深思之後同意，並在同一時期重整台灣立報，使之更朝向教育專業報的目標，以金三角（老師、家長、學生）為核心，找到專業教育報的焦點，每天與報社同仁分享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5]的內容與新聞寫作風格，並且訂閱了幾乎當時中國所有出版的教育專業報參考，這成為每日編輯會議必定比報的項目。

《破報》從一位記者、一位發行、一位編輯開始，逐漸由由三千份的發行量成長到八萬份，成為全台灣第一份免費的文化性刊物，進駐到所有大學校園中，咖啡店，連鎖書店，圖書館都有其蹤跡，並成為第一份進入台北捷運站的報紙，當然，不到一年，隨即因為捷運局認為我們有損「捷運局形象」與「破壞青少身心健康」為由而不再續約。而《台灣立報》則發展為全台灣第一份的教育專業報。

貳、製造共識之外

在台灣，從來沒有什麼左派經驗，更別提左派的辦報經驗了，或者能被左派接受的「機構化經驗」。我們的公共型知識分子（如果有的話）都是在主流媒體上發聲，一邊批評主流媒體一邊在上頭看著自己的文字，自我感覺良好。鮮少人願意走辛苦的道路創立或支持一份有影響力的另類媒體。台灣最不舒服的環境就是沒有另類（There is no alternative），最不舒服的是解嚴後我們卻走上了柴契爾主義的詛咒。我們只有冷戰思維留下來可笑的左右之分。

Lucie 在美國主持亞美研究中心與開啓環太平洋研究領域，至今仍能成為 UCLA 領先全美的學術領域之一，然而二十幾年的組織經驗，在

台灣卻也左右支絀。台灣的媒體環境仍是大資本家的遊戲。《台灣立報》在創刊之際，還沒正式發行就有三千多個訂戶，然而卻沒有任何發行單位願意發送，在當時兩大報的壟斷通路下，台灣新興的報紙只能透過自組聯運系統，卻也非常辛苦。

Noam Chomsky 曾在全美左派刊物 *Z Magazine* 上發表過一篇 “What makes mainstream media mainstream?”^[6]，其精簡扼要的觀點仍是至今我看過最好的討論之一。他論及主流媒體不外乎有幾個面向，「服務統治菁英階級的興趣」，「娛樂大眾」，「監督者而非參與者」，「製造共識」（manufacture consent）（這個觀點也曾被拍過電影），以及最重要的「議題設定」（setting agenda）。

回想 Lucie 回台之後的努力，其所作為豈正是為了要破除主流媒體的宰制？她不斷強調記者編輯在處理每則新聞都要自問：「誰得利？誰失利？誰贊成？誰反對？」不獨為統治階級的興趣採訪；《台灣立報》向來關注原住民、新移民、銀髮族、同志與變性者權利，為弱勢者發聲當然會與統治階級的利益相左；鼓勵各種團體的發聲（透過採訪），與不同的團體合作版面（共同製作，雖然某種程度可能犧牲品質），讓媒體成為「參與平台」，從而破壞「共識」的武器。

參、另類媒體：制度內民主與制度外的社會性

若要談論另類媒體，問題變得比較複雜，因為主流與另類的界線總是浮動，時而相斥時而同流。在 2003 年起，我與 Lucie 在世新大學新聞系曾和開了「另類媒體」與「媒體實務」等課程，以有點規範式的整理出另類媒體與主流媒體一些性質上的差別：

表 1：主流媒體與另類媒體的比較

目的	主流媒體	另類媒體	附註
Aim	營利	社會集體公益、理想	由此可知對於另類媒體而言，只要理想存在，媒體的存在與否並不重要
Product	對有消費能力的人所製作的	內容取向，非討好閱聽眾	例如 Project Censored，由美國大學所做的新聞評鑑，從所有美國境內另類媒體的新聞內容來篩選主流媒體刻意遮掩的新聞，評審為學界、各行各業者。查證後選 25 則出來，已有 25 年歷史。
Rreceiver	被動受眾	積極參與的受眾	
收入來源	廣告	訂戶、募款、捐助	如 Ms. Magazine 在路線之爭後，改成完全不接受廣告，反而更能自由批評，光靠讀者訂閱及存活。
發行	News Agent (派報系統)	叫賣式、發送免費報 (Street Saling)	如 The Big Issue，以關心社會公義的市民為目標讀者，並將遊民組織起來作為派報人員，提供遊民工作，亦訓練遊民，使其有自尊。
智財權	重視	相對不重視，不認為知識為私有財產	如 Public Domain / public document / Creative Commons 的方式釋出內容
資訊來源	專家學者、公關人員	一般民眾	主流媒體被稱為製造共識，維持既有秩序。如 Chomsky 所言「美國民主政治的主要目的就是保障少數有錢人對抗貧窮人」(Chomsky, 1997)。
結構	組織嚴謹	組織型態可商量，並且不希望維持金字塔型僵化組織	
與企業關係	在意	不在意	
組織	權責分明	分工並非很清楚	
員工收入差距	資深／資淺差異大	資深／資淺不影響薪資，若有差異乃因工作條件不同，例如倒垃圾者辛苦，所以薪水高	
科技使用	追求高科技	相對不在意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

這些比較固然適合讓學生理解，不免會忽略另類媒體一些道德上與專業倫理的不同。容我引用同一年一樣在 Z Magazine 發表，Michael Albert 所著之“*What makes alternative media alternative?*”^[7]一文，他有幾個看法，我覺得更能代表《台灣立報》、《破報》以及 Lucie 領導的新聞團體，在台灣媒體界的特殊性。

Michael 提到，首先，在另類媒體的產業結構上，不同另類媒體組織的薪水差距應該縮小；在其中工作的人員不應該沮喪，若將其工作與一般人的工作生命相比，仍值得慶幸；決策應該民主和參與，非傳統的階層管理方式由上而下。其次，另類媒體的組織應該積極消滅種族歧視，消滅性別分工，行動者的工作角色應具體實現女性主義和多元主義的目標；與讀者的關係應該與另類媒體自身的價值與規範一致，開放、多元，完全溝通的，與讀者的關係應是廣泛而社會性的，不只是注重收入與廣告商；另類媒體應該支持同盟。

他更舉出 FAMAS (federation of alternative media projects and institutions plus individuals in support of alternative media) 組織的宣言，進一步勾勒另類媒體於媒體產業中的特殊戰鬥位置：FAMAS 的成員除了服膺於自己的媒體的目標外，更應該一起致力於：

- (1) 由行動界定另類媒體是什麼，為何值得吾人支持。
- (2) 爭取另類媒體的外部支援，強化彼此努力
- (3) 支持欲利用主流媒體完成社會改變的人們
- (4) 增進各另類媒體之間與各讀者群們的溝通

顯然的，Michael Albert 於文中提出的思考並非單就各另類媒體的身段與個別戰鬥力與以評價，無寧更強調另類媒體的內部民主價值與主流媒體鬥爭的社會意義與產生改變的力量。而這些特質正是這些年來我在台灣立報社所學習到最珍貴的經驗。

肆、實驗、實習與實踐的機會

成舍我先生在其創辦的《世界日報》中，就有「勞工版」與「大眾公僕」版，這不正是「另類的」新聞典範嗎？而 Lucie 不也是繼承父親的遺志，將台灣立報社帶領至大資本家辦報無法企及的地位

嗎？Lucie 繼承了那種「至死也要說話」的報人精神。Lucie 在美國二十幾年的組織經驗，在台灣卻也左右支絀。周恩來曾經對 Lucie 說，「我們錯怪妳父親了，他不是敵人，是值得敬佩的『民族資產家』。」^[8]（溫洽溢，2008）你不會懷疑恩格斯是馬克思主義者，那有沒有資產會是個問題嗎？

我以為，作為一個「資產家」的女兒以及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分子，Lucie 關心的，不是培力（empower）也非干預，而是另類、弱勢如何能夠自我發聲，這涉及制度性的力量與培育，Lucie 終其一生當是以此為志。她在美國主持亞美研究中心，接任《立報》，創辦《破報》、《四方報》，創立社發所，成立社會發展基金會，建立舍我紀念館，無一不是「青年培育中心」，這些機構不正是讓年輕人有實驗、實踐與實習的機會嗎？Lucie 做的不是號召、組黨工作，而是制度化的去培育各種熱情與機會，使人們可以為自己發聲。

Lucie 的種種影響著我，另類媒體的想像與實踐是她給予我最好的禮物。在招募新記者的時候，我總會問應徵者興趣為何？喜歡做的事與《破報》的工作一致嗎？能為《破報》做什麼？而不是希望新進的同仁符合《破報》的要求。我總記得 Lucie 在主持亞美研究中心時，用「所需」來分配「所得」，有好幾年的時間，我從未替自己調過薪，甚至與 Lucie 協議將我的薪水分給新進同仁，以勉力維持同仁不至於與主流媒體記者有過大的薪資差距，同仁之間的薪資水準相差甚小，到目前為止，破報的發行督導的薪水甚至高過執行主編，以勞務而非職位為給薪標準也成為《破報》的傳統。從三年前我開始不支薪，每週照常台北高雄來回跑。我告訴自己，當是我繳給 Lucie 的學費吧，學習左派在地球生活的旅行經費。

總結這些年來的經驗，與 Lucie 一起工作或共同學習的到的是：另類媒體的珍貴之處，在於制度內的民主與制度外的社會性。

伍、進步的社會與另類媒體

在《破報》復刊號的編輯室手記裡，我寫到：

我們希望成為台北市另類資訊的通路，這是第一步，不必跨得太遠。如果孽世之聲能夠壯闊動容的話，它既不是另類小眾的喧囂也非菁英的文字遊戲，而是從調查與探索開始。我們既不想成為學院裡的秀異分子的同仁誌，也不想成為媚俗的流行嗅犬，我們希望能有一個空間可以作為不同世代的、多元文化的探詢，可以記錄多於宣傳，探索多於品論。我們既不膽怯，也不敢大意。孽世之聲必須，也非得先從聯絡、建築另翼族群與文化開始。（黃孫權，1998.03）

這種看法，始終沒變。也是我與 Lucie 與工作伙伴們十幾年最真實的經驗與期許。我希望《破報》可以持續下去，或者此種「培育熱情與機會」的制度可以持續下去。這是 Lucie 與台灣立報社所有同仁共同創造的，也是台灣當今最需要的經驗與歷史。

Lucie 走的當日，沒有一家電視媒體報導此消息。電視新聞忙著報導網路美女的票選以及各種影藝消息，這是我們歷經多年後，開放報禁髮禁所有禁得到的成果：電視台以台灣媒體專業人士最愛批評的《蘋果日報》為藍圖報新聞，以最經濟而不花腦力的方式報導新聞。

Lucie 過世幾天後，我勉強自己參加三鶯部落的抗爭尾牙，在三鶯部落聚會所內，我看到牆壁整面貼滿《台灣立報》的報導，我在前駐足許久，新聞報導與社會運動走在一塊了，這就是另類媒體的必要，我想這也是 Lucie 此生最好的證成。然後我抹了淚，報社所有同仁也都抹了淚兒，各自回到工作崗位，繼續採訪，說真話，寫稿，編輯，印刷，發送。說真話就是台灣立報社唯一的「編輯白皮書」，而「誰得利，誰失利，誰贊成，誰反對」四句箴言，就是台灣立報社的每日社論。Lucie 對於另類媒體與社會整體的進步的看法是「接和」（articulate）與辯證的，亦即唯有進步的社會能夠產生另類媒體，而另類媒體則成為社會進步的保證。她留給我們的，是對於社會進步與轉化的整體掌

握，是對於另類媒體不以自身存活為目的，而成為社會進步的試紙這種結構的理解，另類媒體從來都不是以文本、形式或者自許進步的種種意識型態所自我宣稱而獲得保證的。

「作你喜歡作的事」，Lucie 常說。而我們在這兒，現在和以後，都會這樣作。

最後，我想用 Lucie 寫於破報 1997 年休刊詞上的一段話，共同紀念 Lucie 在台灣媒體歷史上的特殊性，這段話同時也是期許，對於另類媒體想像與實踐的最好誓言。

另類的小眾刊物到底在台灣有沒有生存的的空間？破報在經營了兩年多後後宣布休刊，也許會令讀者和媒體觀察家下一個否定的結論。但我只願意承認破報沒有辦得讓那些自許進步的人心甘情願掏錢出來訂閱，而絕對否認台灣根本沒有足夠的人能支持一份像破報這樣的刊物。

每一主流在某個時期都是另類；每一另類都有可能在某個時期成為主流。正因如此，一個進步的社會必須經營的、持續的、廣泛的讓各種另類充分的發言；社會裡自許進步的人，也必須努力保障另類的發言空間。（成露茜，1997.11）

註釋

- [1] 成露茜博士的發言部分影片，可見此 http://www.youtube.com/watch?v=hUsUGs8ULzs&feature=player_embedded
- [2] 英國八零年代最重要的另類樂團，其主唱 Morris 為同志，但部分喜歡他們的年輕人沈醉在他們的歌聲中，在現實生活裡卻對「同志」怯步。
- [3] 美國重要的爵士／另類歌手，歌曲大抵以底層人民為描寫對象，如勞工、妓女以及亞洲移民。
- [4] 本文皆以 Lucie 稱呼成露茜博士，因為世間語句沒有比這句更適切的代表她不同的身份位置與人格特質了。
- [5] 美國高等教育報（*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為美國最

重要的教育專業刊物。當時 Lucie 曾從美國直接訂閱到報社內，要求編輯主管們詳細研讀。此刊物介紹可參考其網站：<http://chronicle.com/section/Home/433>

〔6〕現在全文可見 <http://www.chomsky.info/articles/199710--.htm>

〔7〕全文可見網頁庫存：http://subsol.c3.hu/subsol_2/contributors3/alberttext.html

〔8〕這篇獨特的訪談得以一窺 Lucie 早期於美國的研究成果，以及促進中國與美國教育交流的角色。見 <http://www.luciememory.org/149>

參考書目

成露茜（1997.11）。〈輟刊詞〉，《破報》休刊號，2版。

黃孫權（1998.03）。〈發刊詞〉，《破報》復刊號，2版。

溫洽溢（2008）。〈成露茜口述歷史〉，《台灣大學政治學系中國學知識社群研究計畫》，未出版。資料引自 <http://www.luciememory.org/149>

Chomsky, N. (1997.10). What makes mainstream media mainstream? *Z Magazine*, from <http://www.chomsky.info/articles/199710--.htm>

Lucie and Our “Leftist” Experiences to Making News

Huang, SunQuan*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a significant period while I worked with Dr. Lucie Cheng in Lihpao Daily. These experiences would show some of our “alternative media” thinking after decades practice. This article hopes to propose a more broad, and socially-dialectical approach to refram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edia and the alternative. This vision and imagination generated from practice which is the best tribute to Dr. Lucie Cheng and give her proper regards, one of distinguished heritage that she gave to Taiwan.

Keywords: Dr. Lucie Cheng, POTS Weekly, Lihpao Daily, alternative media

*Huang, SunQuan is Chief Editor of POTS, and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Interdisciplinary Art, National Normal Kaohsiung University, Kaohsiung, Taiwan.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蘭嶼的另類媒體與發聲：以核廢料與國家公園反對運動為例

Alternative Media and Voices on Orchid Island: A Case Study of Opposition Movements to Nuclear Waste Storage and National Parks

doi:10.6195/cjcr.2010.17.03

中華傳播學刊, (17), 2010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7), 2010

作者/Author：郭良文(Liang-Wen Kuo)

頁數/Page：43-74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0/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195/cjcr.2010.17.03>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蘭嶼的另類媒體與發聲： 以核廢料與國家公園反對運動為例^{*}

郭良文^{**}

摘要

本研究透過對成露茜、Carpentier、Fontes 與 Downing 等學者所提出的觀念，歸納出另類媒體的定義，此定義運用的核心概念包括近用媒介、主動閱聽人、市民參與、多元表達方式、意識覺醒、對抗主流媒體、反抗文化、反壓迫、弱勢團體主體性、市民社會與民主化等。本研究透過訪談資料與媒體內容之比較論述，呈現蘭嶼原住民在反核廢料與反對國家公園設置事件上的聲音與觀點。其次，本研究也分析蘭嶼的反對運動領袖如何運用主流媒體與另類媒體，透過結盟，進行媒體策略之擬定，以散播運動目標、創造有利於蘭嶼原住民的報導。最後，本研究將另類媒體的概念區分成另類媒體的使用者、另類媒體的運用方法、以及另類媒體的目的等三個層面，試圖勾勒出另類媒體的理論意涵。

關鍵詞：另類媒體、市民社會、社區媒體、蘭嶼、達悟、雅美

^{*} 本文為紀念成露茜老師而撰寫，內容係國科會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國家型科技計畫「蘭嶼原住民媒體數位典藏計畫」與「達悟歌謠與庶民文化數位典藏計畫」（NSC 98-2631-H-009-005）之部分研究成果。感謝洪彩鈞同學與謝佩妤助理協助整理相關資料。

^{**} 郭良文為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傳播與科技學系教授，E-mail: lwkuo@mail.nctu.edu.tw。

壹、另類媒體的定義與討論

當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汲汲經營於版圖的擴充，促使現代化、工業化與發展傳播成爲主導社會發展的意識型態。此時，大眾傳播媒體、消費流行文化與大眾社會興起，漸漸創造了一個主流的價值與媒體文化。社會上爲了提供有別於大眾傳播、主流媒體的聲音，於是「另類媒體」(alternative media)漸漸形成，以有別於主流媒體的論述，甚至是對抗主流文化的傳遞。因爲有特定的目的與需求，所以創造了另類媒體存在的理由。因爲展現多元價值、包容差異性，所以另類媒體的出現也挑戰了大眾社會逐漸形成的單面向性與所充斥的工具理性。

學者(Lewis, 1993; Pietikäinen, 2008)指出，20世紀興起的「新社會運動」(New Social Movement)，提供了另類媒體孕育的場所。包括原住民運動在內，由於「族群運動無法放置在國家主義、環球主義、進步追求的政府現代性之下，所以被主流大眾傳播媒體所忽略」(Pietikäinen, 2008: 174)。美國印地安人、澳洲原住民、或蘭嶼達悟族(或稱雅美族)這些少數族群爲了爭取生存權、爲了讓自己民族的聲音可以被聽到，往往必須運用族群媒體、另類媒體來傳遞訊息、發動力量。

從1960年代以來，另類媒體的相關文獻涵蓋了許多名詞的討論，包括如游擊影像紀錄(guerrilla video)、海盜電視(pirate TV)、倡議影像紀錄(advocacy video)、社區媒體(community media)、參與式媒體(participatory media)、激進媒體(radical media)、公民媒體(citizen media)、以及另類媒體等(Fontes, 2010: 381)，因此另類媒體的範圍很廣。以下就幾位學者的分析與界定來加以探討：

依據Fontes(2010: 381)的分析，另類媒體的一般性原則與共識，包括以下五點：

- (1) 媒體製作的科技與參與之近用(access)是核心理念。
- (2) 在媒體生產與決策中，追求民主的社會關係。
- (3) 重視被主流媒體忽視的議題與觀點。
- (4) 另類媒體的實踐植基於社會凝聚與反抗壓迫的倫理。
- (5) 非營利導向。

簡言之，以上五點可以用平等近用、民主化、呈現被忽視觀點、認同與反壓迫、以及非商業性等概念來理解另類媒體的概念。

Carpentier, Lie, & Senaes (2003: 56) 提出，另類媒體與主流媒體不同之處，在於另類媒體擁有以下四個特點：

- (1) 小規模，傾向於特定社群，可能是社會上的劣勢群體，尊重多樣性。
- (2) 獨立於國家與市場之外。
- (3) 水平結構，在民主化與多重化 (multiplicity) 的範圍之內，允許推廣閱聽人的近用與參與。
- (4) 刊載非支配型的論述與再現，強調自我再現的重要性。

以上四點可以用弱勢團體、市民社會獨立性、平等近用、以及呈現被忽視觀點等面向來瞭解。此外，Carpentier et al. (2003: 57) 也指出，另類媒體可以補充、或對抗主流的新聞論述與再現，同時鼓勵非專業人士與義工的參與。

Downing 是著名的另類媒體領域之研究學者，在他 2001 年出版的 *Radical Media: Rebellious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一書中，他運用「激進另類媒體」(radical alternative media) 的概念來說明另類媒體的意涵。Downing (2001: 3-99) 在本書當中所討論到的概念相當多，包括流行文化、閱聽人、社會運動、民主、發展權力、霸權、抵抗、藝術工作、以及公共領域等概念都與激進另類媒體相關聯，但作者並沒有針對此概念作一個明確的定義。衡諸其論點，另類媒體的精神至少可以包括以下幾點：

- (1) 在流行文化中直接或間接表達出反對立場。
- (2) 最積極的主動閱聽人與媒體使用者。
- (3) 反抗文化 (oppositional cultures) 與抵抗 (resistance)。
- (4) 另類媒體寄存於社會運動，與意識覺醒 (conscious-raising) 相關聯。

以上四點可以用多元表達方式、主動閱聽人、反抗文化、以及社會運動等面向來理解 Downing 的一些核心概念。

國內學術圈對於另類媒體的研究尚屬初步階段，相關文獻付諸缺如。2004 年 4 月 11 日，成露茜在公共電視所舉辦的《與大師對談》中，

對另類媒體下了一個註腳，她的一番話強調社會發展、訊息分享、市民參與、主體性弘揚、以及弱勢團體發聲等面向是另類媒體的重要概念（成露茜，2004）：

另類媒體最基本的原則是它以推動社會整體為目標……另類媒體認為智慧財產是公共財，它反對私有化，它提倡 DIY，任何人都可以做媒體，說自己的話，唱自己的歌……它是多元的，它不需要反映社會上已經很大的聲音，而是讓許許多多還沒有發聲的人，用自己的型式發聲。

表 1：四種另類媒體之觀點

成露茜 (2004)	Carpentier et al. (2003)	Fontes (2010)	Downing (2001)
弘揚主體性	呈現被忽視觀點	呈現被忽視觀點	多元表達方式
分享訊息	補充或對抗主流論述	認同與反壓迫	反抗文化
社會發展、非營利	市民社會、獨立性	非商業性	社會運動
市民參與	非專業人士、義工參與	民主化	主動閱聽人
弱勢團體	弱勢團體		意識覺醒
	平等近用	平等近用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表格中置於同一列的概念彼此的性質相關。

綜合以上各種觀點，本研究歸納出另類媒體的定義說明：另類媒體是一個獨立、非商業的平等近用媒介，透過主動閱聽人與市民的參與、多元表達的方式來分享訊息、建立群體認同與促使意識覺醒。同時，另類媒體透過被忽視觀點的呈現、或以對抗主流媒體的新聞論述與再現等方式，形塑反抗文化或進行反壓迫，進而弘揚弱勢或少數團體之主體性、促進市民社會與民主化的發展。

接著下來的幾節內容，將以此定義的核心概念為依歸，界定本研究之研究問題，並透過媒體的內容分析與蘭嶼反對運動領袖的訪談，說明蘭嶼另類媒體的型式與內容，及其與主流媒體之不同。本文同時亦針對另類媒體的概念架構與理論意涵加以討論。

貳、研究問題與方法

一、議題脈絡與研究問題

蘭嶼位於台灣東南四十餘哩的太平洋中，地處偏僻，早期的島上居民被稱為是雅美族人，後來經過族群正名運動之後，也以達悟族人來稱呼。蘭嶼與外界隔離，當地居民的傳統社會、風俗、儀式慶典、惡靈文化、以及神話傳說，不但與台灣本島的漢人居民有極大差別，和台灣其他原住民其實也相當不同，文化獨殊性很高。1982年，台電至蘭嶼設電廠與核廢料儲存場，大大地改變了蘭嶼人的生活方式，也揭開了蘭嶼人抗爭的序幕。有了電力之後，蘭嶼人可以透過衛星的接收，看到數位電視節目。在廣播的方面，由民間機構成立了自己的電台，居民也能夠清楚地接收到中廣的節目，在傳播及資訊事業急速蓬勃的發展下，一向自成體系的蘭嶼面臨外來的極大衝擊。

蘭嶼核廢料儲存場原先計畫建設六期工程，第一期工程共儲存近10萬桶核廢料，已經飽和。然而，蘭嶼居民反對從原子能委員會接手的台電公司，繼續第二期工程的擴建，並要求台電將核能廢料儲存場遷離蘭嶼。1987年12月，由於台電招待蘭嶼的鄉民代表赴日本參訪而引發爭端，蘭嶼居民展開了第一次的抗爭行動，當時的抗爭規模較小。在此之後，蘭嶼人分別在1988年2月、1988年4月、1991年2月展開數次大規模的自救、抗爭活動，除了在蘭嶼核廢料儲存場之外，也組織族人到台北進行示威抗議，媒體紛紛報導，引起了海內外各界的注目。

與蘭嶼反對運動相關事件的學術文獻中，唯一比較完整的論文，是王嵩音1998年在《台大新聞論壇》所撰寫的文章，題名為〈原住民議題與新聞再現：以蘭嶼核廢料場抗爭為例〉。這篇文章的觀點主要是從「新聞框架」的角度，探討主流媒體在三個核廢料抗爭階段的內容再現，且針對14份報紙的176篇報導進行內容分析。王嵩音（1998：111）的研究結果指出，在蘭嶼核廢料抗爭前與抗爭階段，報紙媒體在報導主題、消息來源、與報導方向等方面「一律是偏向權威的一方，蘭嶼原住民的聲音並未受到重視……充分顯示媒體支持維持現狀的主流意識型態」。這篇論文針對主題、消息來源、報導方向、以及新聞框架等面向做了詳細的分析，對於瞭解蘭嶼核廢料抗爭議題的媒體再

現有相當的助益，對於主流媒體如何處理原住民議題也有重要的啟發。不過，本文的研究範圍僅限於主流媒體，有關蘭嶼當地媒體的相關報導並沒有討論。同時，本文從「新聞框架」的角度探討，未進一步區分「一般新聞報導」與「評論、專題性報導」之差異，致使部分結論未能掌握更細緻的內涵。除了這篇文章討論到蘭嶼反對運動與媒體再現的關係之外，其他的相關文獻與討論則付諸闕如。

本研究以核廢料設置與國家公園規劃的反對運動為例，針對蘭嶼的另類媒體與另類發聲進行瞭解，結合對另類媒體所進行的定義，探討以下研究問題：

- (1) 蘭嶼原住民在反核廢與反對國家公園設置事件上的聲音是什麼？另類媒體所呈現的觀點為何？與主流報紙的觀點有何差異？
- (2) 為創造有利於蘭嶼原住民的報導並展現弱勢族群的主體性，蘭嶼的反對運動領袖如何擬定媒體策略、集結社會運動能量、並運用各類型媒體發聲？
- (3) 另類媒體的理論意涵為何？對於族群傳播的價值何在？另類媒體與市民社會與民主化發展的關聯性何在？

二、研究方法

(一) 事件與案例選擇

雖然蘭嶼的核廢料場還繼續存在，目前仍有一些零星的核廢料最終處置地點選擇、與回饋金議題的報導，但是大規模的抗爭運動已經停歇了很久。本研究所探討的內容主要是發生在 1980 與 1990 年代的抗爭事件與相關媒體報導。本研究透過報紙與其他媒體的歷史資料，進行內容的議題分析，同時針對蘭嶼反對運動的領導者進行訪談與資料蒐集的工作。

蘭嶼原住民過去曾經經歷過的大型反對運動，主要是核廢料的抗爭與國家公園的反對設置，這兩項爭議性大、衝突激化、歷經時間漫長的歷史事件，是理解地方媒體與主流媒體報導再現內涵的最佳案例，不但可以觀察到原漢觀點的異同，也能夠瞭解另類媒體在運動當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時，由於「反核廢料」運動是蘭嶼全島族人具有高度共識的抗爭行動，而「國家公園」設置案雖然多數族人最後持反對的

決定，但當地族人對此事的決議卻前後不一致，達悟族人之間也並未達成真正共識，兩個案例有共同點、也有相異性，研究價值高，因此成爲本研究策略性的案例探討。

(二) 訪談進行

爲了充分瞭解反核廢料與反國家公園運動的島內外媒體運用情況，研究者於 2010 年 4 月 28 日至 4 月 29 日期間，赴蘭嶼親自進行訪談，請受訪者回憶過去所參與反對運動的過程。本研究訪問的對象有三位，都是當年反核廢料與反國家公園運動的主要青年領袖。張海嶼牧師曾擔任「蘭嶼民族議會」籌備會發言人，出席許多記者會，擔任提問人。郭健平先生曾任台東縣縣議員，媒體策略擬定者，負責記者聯繫工作，並擔任發言人、母語翻譯人，是整個運動的核心人物。夏曼藍波安先生是當地著名的作家，他是反核廢達悟族宣言與各項文宣的擬定者，扮演反對運動宣傳的重要角色。能夠成功地訪問到這三位運動領袖，對本研究瞭解蘭嶼的運動領袖如何策略性的運用另類媒體與主流媒體、並創造有利於當地原住民的報導有極大助益。

表 2：本研究訪談對象

姓名	日期與時間	在反對運動中角色	個人背景與現職
張海嶼	2010.04.28 (13:00-14:30)	反核廢、反國家公園運動領袖，蘭嶼民族議會籌備會發言人	玉山神學院畢業，東清基督長老教會牧師
郭健平	2010.04.29 (12:30-14:00)	反核廢、反國家公園運動領袖，發言人	玉山神學院畢業，曾擔任基督長老教會傳道、台東縣議員
夏曼藍波安	2010.04.29 (18:30-19:40)	反核廢、反國家公園運動領袖，反對運動宣言起草者與文宣主筆	清華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畢業，運動當時是計程車司機，現在是著名作家、研究員

(三) 媒體分析內容

本研究爲了回答第一項研究問題，針對媒體內容，選定重要議題案例進行比較分析，以瞭解蘭嶼原住民另類媒體在反核廢與反對國家公園事件上的聲音、觀點與意識型態，以及與全國性報紙觀點的異同。

在全國性報紙部分，選擇了《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兩大報的內容為範圍，這兩份報紙在當時是全台灣最具有影響力的平面媒體，對蘭嶼相關事件的報導量也很大，加上較易取得相關的歷史報導資料電子檔，有利進行電腦化資料分析，故被本研究選為主流媒體的代表。在地方的社區媒體部分，本研究選擇島上所有當時固定出刊的報紙或新聞刊物為分析對象，以《蘭嶼雙週刊》為主要內容，另外再加上《藍青通訊》、《蘭恩通訊》、《飛文季刊》以及《堂區通訊》等。此外，蘭嶼的地方媒體還包括《藍嶼廣播電台》與當地族人用錄影機拍攝之VHS、DV等影片內容，這些媒體內容也納入本文的分析範疇之內。

《蘭嶼雙週刊》是蘭恩文教基金會所創辦的報紙類刊物，創刊於1985年2月，是第一份屬於蘭嶼人的地方刊物，也是蘭嶼島上最核心的報導刊物，至2010年已出版超過400期。^[1]創刊的原因是「希望擁有一份屬於自己眼光來看的刊物」，讓外界了解蘭嶼，並凝聚蘭嶼島民的共識。每期發行量約1,700份，除在蘭嶼島上免費發送，也有將近1,000至1,200份免費寄送給旅台蘭嶼人及蘭恩支持者。因蘭嶼島上五十歲以上的老年人口識字率偏低，故讀者以中青年齡為主。整體而言，蘭嶼雙週刊雖然是漢人的基金會所設立的報刊，但是內容都是由達悟族人自己採訪、寫作與編輯的，影響力在蘭嶼與旅台青年當中有一定的份量。蘭嶼反對運動領袖夏曼藍波安就指出，《蘭嶼雙週刊》對反核廢運動的推動產生實質的幫助，「因為這份刊物有發行到台灣去，很多旅台蘭嶼人可以看得到」（郭良文，訪談記錄，2010.04.29.）。

參、蘭嶼媒體與主流媒體報導範例比較

一、核廢料與國家公園事件之媒體內容檢索

為了取得相關報紙與刊物的內容，本研究使用《中時新聞網》、《聯合知識庫》、以及由作者擔任主持人所建置的《蘭嶼原住民媒體資料庫》等網路資源，針對核廢料事件與國家公園事件，進行關鍵字詞的檢索，檢索期間自有相關資料出現的日期開始，至2010年3月為止。有關核廢料事件所使用關鍵字包括：核廢料 蘭嶼；核能 蘭嶼；台電 蘭嶼；

核廢料 達悟；核能 達悟；台電 達悟；蘭嶼 抗議；反核 蘭嶼；蘭嶼 抗爭。國家公園事件所使用關鍵字包括：蘭嶼 國家公園；達悟 國家公園；蘭嶼 抗議；蘭嶼 抗爭。依此檢索條件，再刪除不相干或重複的資料，總共獲得 688 篇媒體全文內容資料^[2]（見表 3）。其中，就所有項目的總報導篇數而言，中時新聞網、聯合知識庫、以及蘭嶼原住民媒體資料庫分別有 238 篇、213 篇、237 篇報導，數量幾乎相當。其中，蘭嶼原住民媒體資料庫的數量包括了 17 部民眾的紀錄影片與 1 個廣播節目。然而，國家公園事件的報導普遍比較少，又以中時新聞網的比例偏低，顯見中國時報對此議題的興趣欠缺。另外，在核廢料事件的報導中，中時新聞網的報導則數最多。

表 3：核廢料與國家公園事件之媒體內容檢索篇數結果

項目／篇數	中時新聞網	聯合知識庫	蘭嶼原住民媒體資料庫		
			蘭嶼雙週刊	其他刊物與 影音紀錄	小計
核廢料事件	228	167	160	18	178
國家公園事件	10	46	50	9	59
合計	238	213	210	27	237

註：資料分析的日期範圍為：最早一篇撰寫於 1980 年 5 月 4 日，最後一篇寫於 2010 年 2 月 11 日。

本研究首先針對出現在《中時新聞網》、《聯合知識庫》與《蘭嶼原住民媒體資料庫》報導中的一些重要議題，將所搜尋到的 688 篇媒體報導內容作為資料加以檢索、進行數量統計，並進行比較（見表 4）。大體而言，有關「驅逐惡靈」、「核廢料回饋金」、「蘭嶼民族議會」、「抗爭／示威／衝突」以及「蘭嶼文化／達悟文化／雅美文化」等報導的數量差異性較小。不過有關蘭嶼民族議會的議題，《蘭嶼原住民媒體資料庫》所報導的篇數雖不多（13 篇），但次數卻很多（37 次），顯見民族議會是蘭嶼內部的重要議題。另外，有關「蘭嶼文化／達悟文化／雅美文化」的報導，《蘭嶼原住民媒體資料庫》與《聯合知識庫》的報導次數相當，但卻與《中時新聞網》有很大的差異，顯示中國時報對討論蘭嶼當地文化是低度再現的。

表 4：各類媒體內容報導數量之比較

內容則數	中時新聞網	聯合知識庫	蘭嶼原住民媒體資料庫
驅逐惡靈（驅除惡靈／驅惡靈）	8 篇（14 次）	5 篇（6 次）	7 篇（10 次）
回饋金（核廢料回饋金）	3 篇（109 次）	30 篇（135 次）	31 篇（126 次）
民族議會（蘭嶼民族議會）	13 篇（28 次）	8 篇（17 次）	13 篇（37 次）
生存權／滅族	16 篇（29 次）	8 篇（11 次）	28 篇（54 次）
抗爭／示威／衝突	104 篇（281 次）	78 篇（162 次）	74 篇（207 次）
生態／捕魚／海洋／自然	28 篇（45 次）	54 篇（148 次）	77 篇（236 次）
政府官員（台電／原能會／經濟部）	68 篇（509 次）	60 篇（537 次）	36 篇（393 次）
蘭嶼文化／達悟文化／雅美文化	7 篇（17 次）	26 篇（60 次）	30 篇（59 次）

資料來源：從本研究蒐集的 688 篇媒體報導中，經 NVivo 8.0 質化資料分析軟體整理而來。

主流媒體與蘭嶼社區媒體之間明顯差異性比較大的，是有關「生存權／滅族」、「生態／捕魚／海洋／自然」以及「政府官員（台電／原能會／經濟部）」等這些面向的報導。以生存權與滅族的部分而言，《中時新聞網》有 16 篇（29 次）報導，《聯合知識庫》有 8 篇（11 次）報導，以及《蘭嶼原住民媒體資料庫》共有 28 篇（54 次）的報導量；而「生態／捕魚／海洋／自然」等面向，主流媒體與社區媒體之關注的差異更大，《中時新聞網》有 28 篇（45 次）報導，《聯合知識庫》有 54 篇（148 次）報導，《蘭嶼原住民媒體資料庫》則有高達 77 篇（236 次）的報導。顯見主流媒體比較忽視生存權、滅族、生態、捕魚、海洋與自然等這些方面的觀點，而這些正是達悟人所賴以為繼的生存條件，蘭嶼地方媒體則可以將這些「被忽略的觀點」加以呈現。

而提到或引述「政府官員」（包括台電、原子能委員會、與經濟部的官員）的報導，《中時新聞網》有 68 篇（509 次）報導，《聯合知識庫》有 60 篇（537 次）報導，《蘭嶼原住民媒體資料庫》只有 36 篇（393 次）報導，呈現出主流媒體與當地媒體的顯著差異。這個發現與王嵩音（1998）對台灣報紙內容分析的結果一致，即主流報紙媒體在報導主題與消息來源方面「偏向權威的一方」（同上引，1998：11）、依賴政府官員的見解，以及時常報導政府的說法。

二、報導案例之分析

除了各媒體在相關議題上所呈現的篇數、次數的量化比較分析之外，本節針對文化、組織、與生活等層面，經立意抽樣，選擇列於表四當中的三個案例，進行質性的詮釋與評述（見表 5）。分別是代表文化面的「驅逐惡靈」、代表組織面的「蘭嶼民族議會」、以及代表生活面的「生態／捕魚／海洋／自然」等報導內容。本節從質的內容所進行的比較分析，可以較深入地勾勒出主流媒體與另類媒體報導內涵上的差異。

表 5：各類媒體內容重點摘要與意義說明

內容報導	中時新聞網	聯合知識庫	蘭嶼原住民媒體資料庫
（文化面） 驅逐惡靈／驅除惡靈	（新聞）抗爭活動點滴與核廢桶鏽蝕抗議 → 客觀、平衡、官方報導模式	（新聞）營建署和雅美族人溝通 → 平衡、官方報導模式	（新聞）蘭嶼鄉長與達悟族人宣誓土地主權 → 結合主觀想法與客觀事實報導
（組織面） 民族議會／蘭嶼民族議會	（社論）政府不守信用、呼籲遷廠 → 為蘭嶼人說話、媒體監督政府施政	（專題）說明文化經驗與地方人物 → 從蘭嶼人的角度進行中立性報導	（評論）漢文化入侵、強權對弱勢、生存權益與尊嚴 → 對立論述與主體發聲
（生活面） 生態／捕魚／海洋／自然	（新聞）經濟部願意與蘭嶼民族議會與鄉親尋求共識 → 客觀、官方報導模式	（新聞）敘述反核軍師夏曼藍波安的想法 → 從蘭嶼人的角度進行中立性報導	（新聞）雅美人已忍無可忍、發起救蘭嶼活動，長老發言表達 → 耆老、主體發聲
	（新聞）經營民宿、浮潛、生態旅行 → 從觀光產業觀點報導，欠缺文化內涵	（新聞）獨特文化與特殊自然資源，行政院評估國家公園 → 官方、客觀報導模式	（影像記錄）蘭嶼民族議會抗爭政府藐視，提出六項訴求 → 對立論述與主體發聲
	（新聞）不輸綠島的自然風貌 → 自然只是一種描述地方的形容詞	（專題）雅美族人必須砍樹、捕魚，依賴自然生活 → 從蘭嶼人的角度進行客觀報導	（新聞）全體達悟族反核宣言，給後代祖先遺留的自然資源 → 與族群傳承論述結合
			（讀者投書）蘭嶼文化傳統生活與自然環境的共生 → 經驗、與族群文化論述結合

資料來源：作者從所蒐集的媒體報導中立意抽樣取得的分析樣本。

（一）文化面：以驅逐惡靈為例

在蘭嶼原住民的文化當中，惡靈（anito）是魔鬼的化身，也是一切疾病、死亡、與厄運的代名詞，在蘭嶼各種傳統儀式中都有驅趕惡靈的項目，人人避之唯恐不及。自從台灣政府將核廢料場設置在蘭嶼之後，蘭嶼人視核廢料是毒藥，是惡靈新的化身，也因此「驅逐惡靈」的口號相當具有地方文化意涵，成為達悟人希望核廢料場遷快快離蘭嶼的文化指涉與符號意義。從有關驅逐惡靈（包括驅除惡靈、驅惡靈）的報導篇數來看，雖然《中時新聞網》有 9 則、《聯合知識庫》有 5 則、《蘭嶼原住民媒體資料庫》有 7 則，報導數量相仿，但報導的實質內涵確有很大差異。

《中時新聞網》一些新聞的標題是：「今年的四月二十八日，剛好是前蘇聯轍諾比核能發電廠災」（1996.04.28）與「蘭嶼貯存場租約失效，台電九月提回饋續租」（1999.07.05）。前者報導蘭嶼過去抗爭活動的點滴，如提到揭開反核序幕的鄉民代表去日本接受招待一事、雅美人發起 220 驅逐蘭嶼惡靈反核廢料行動，以及 1994 年蘭嶼核廢料貯藏場發生儲存桶鏽蝕風波等，共約 600 字的內容浮光掠影式的帶過去。後者約 900 字的報導中，描述蘭嶼廢料貯存場國有地的問題，所提到的當地相關人物只有蘭嶼鄉公所，其他則是提到如國有財產局、經濟部、國防部、以及原子能委員會高層官員等。許多新聞性報導的內容，由於強調「客觀」、「平衡」、或「官方」的報導，所報導內容距離當地人相當疏遠，沒有將驅逐惡靈的文化意涵納入。

《中時新聞網》另有一則「除了遷移，別無選擇」的社論，是站在達悟人的立場批評政府的失信。內容寫說：

蘭嶼的核廢料會演變成今天這樣巨大的抗爭，傾全島、全達悟族之力，以驅趕惡靈，關鍵是政府的不守信用。國民黨政府時代，他們被欺騙了數次。從罐頭工廠、核能無害、不再增加核廢料，到遷移的承諾，沒有一次兌現。陳水扁政府也一樣，在總統競選時，允諾要遷移，兩年過去了，未見兌現；現在連核能後端處理基金都挪作它用，更不必說遷移了。（中國時報社論，2002.05.05）

本社論為蘭嶼人說話、也同時監督政府施政。主流媒體透過社論的發言，比新聞報導較貼近蘭嶼當地人的觀點。

《聯合知識庫》有一則新聞內容主要在報導營建署和雅美族人的溝通過程，是以平衡、官方報導的模式敘述。另一則由記者胡文輝、高鴻飛所撰寫的 2,700 字專題報導，標題是「鄉土情懷系列續篇 雅美悲歌 伸出優越感援手 加深雅美人困境」（胡文輝、高鴻飛 1993.04.18）。這篇報導提到「爲什麼愛之欲其生的國家公園，在雅美人眼中會變成惡之欲其死的惡靈？從文化碰觸的經驗來看，將會比較接近真相……」。這篇專題報導引述了一些地方文化的特色，並列舉出許多蘭嶼原住民個人的生活經驗，如提到謝加仁與謝永泉父子的互動、提出許多當地人的姓名與想法，是一篇採取蘭嶼人觀點所進行分析的報導。不過，記者的立場仍然是用中立、第三者的角度進行評述，並不是從達悟人主體性的角度來發聲。不過，由上述所討論的案例可以推知，主流新聞性的報導偏向表面、客觀化敘述，而評論性與專題報導則能提供較爲深入的當地觀點。

《蘭嶼原住民媒體資料庫》中的蘭嶼雙週刊部分，則有許多代表族人發言、立場鮮明、展現很強的主體性。標題如「收復失土、驅逐惡靈」（2002.12.31）、「詛咒惡靈的省思」（1999.02.28）、以及「雅美人發出怒吼抗議核廢壕溝增建 要求台電信守承諾尊重鄉民生存權」（1995.06.11）等都屬於有強烈情感的標題，其中一篇報導提出：「……已經不再只是個單純的環境生態的維護抗爭活動而已，更涉及到了一個強權民族對待弱勢民族生存權益、族群尊嚴的問題！」（Misiva, 1999.02.28）。另一篇「雅美長老赴台陳情旅費 各界團體熱心贊助」（1995.07.23）標題雖平和，內文則提到：現場懸掛的抗議布條標語「國家暴力何時了」、「自治救蘭嶼」、「台電核廢九萬桶、滅我 TAO 三千人、爲雅美族人生死存亡而戰」、「命運共同體是謊言、核廢料是滅族政策」等，充分表達了當地人對核廢憤怒的控訴，也代表了一種反漢族霸權的聲音。

(二) 組織面：以蘭嶼民族議會為例

《中時新聞網》一篇由陳宏銘記者所報導的「反核抗爭高掛免戰牌 離奇雅美族人臨時取消填港活動 是否化明為暗發展備受矚目」新聞(1995.08.06)。報導蘭嶼鄉民原來決定八月五日再發動抗爭，但因該鄉未提出合法的集會遊行申請，且警方更於事前放聲將動員大批的警力、強勢取締。此報導指出，「四日晚上的蘭嶼民族議會中，決議臨時取消該活動……若其抗爭動作真的『化明為暗』，並避免與警方產生衝突，則此反核事件的發展仍值得矚目」。這是一篇客觀報導事件始末，同時呈現了漢人對此事件好奇的觀點。

其他新聞的內容，如《中時新聞網》「經濟部願意與蘭嶼民族議會與鄉親尋求共識」與《聯合知識庫》「政務委員、台電董事長與蘭嶼民族議會代表協商」等內容，都是以客觀、官方報導的模式進行撰寫。《聯合知識庫》的一篇由記者曹銘宗所撰寫的「達悟反核軍師：打造蘭嶼為明珠 夏曼藍波安認為蘭嶼應回歸『人之島』營造成具世界級的原住民自治區」新聞(2002.06.06)，詳實敘述蘭嶼反對運動領袖夏曼藍波安的想法，這是一篇從蘭嶼人的角度進行中立性報導。

《蘭嶼原住民媒體資料庫》中一篇新聞寫到「雅美人已忍無可忍」、「發起救蘭嶼活動」，並描述當地耆老的發言內容，展現出另類的發聲。而由蘭恩文教基金會拍攝的 DV 錄影帶「蘭嶼反核遊行」(2003.01.01)，紀錄蘭嶼民族議會抗爭台灣政府的藐視，並提出六項訴求的過程。同時，在蘭嶼雙週刊刊登的〈蘭嶼民族議會聯合聲明〉(蘭嶼民族議會，2002.12.31)，要求台灣政府回應，落實達悟人六項訴求如下：

- (1) 強烈要求台灣政府公開聲明 2002/12/31 日以後台電非法侵占我們的土地是違法的行為。
- (2) 強烈要求行政院訂定核廢料遷場之時間表，並嚴正要求刪除不利於蘭嶼核廢料遷場之條文，盡速立法通過之，使遷廠除役事宜順利合法化。
- (3) 強烈要求台灣政府違憲違法租用我們的土地的行為，給予我們合法合理的賠償，直到未來核能輻射歸於自然背景值為止。

- (4) 強烈要求台灣政府派出決策團隊，如行政院正、副院長，遷場委員會召集人，社區總體營造委員會召集人，經濟部部長（行政院原民會主委、台電董事長、台東縣縣長列席）與蘭嶼民族議會就核廢料遷場違法事宜協商。
- (5) 以上秉持五四議定書之精神外，上述之訴求建請台灣政府於十五日內回應，否則一切後果由台灣政府負責。
- (6) 蘭嶼民族議會，及全體族人秉持過去理性的抗爭，期許達成雙贏的局面。

蘭嶼民族議會，及全體族人 敬上 2002.12.30

以上的要求均屬於達悟人站在主體位置發聲的範例，類似這樣的宣言或訴求，在《蘭嶼原住民媒體資料庫》中常有所見。由此觀之，此類型「對立論述」與主體發聲在蘭嶼的另類媒體中獲得了具體的展現。

（三）生活面：以生態、捕魚、海洋、自然為例

和前述兩項的分析一樣，《中時新聞網》與《聯合知識庫》等主流媒體的一般新聞報導多以官方、客觀、中立的報導模式進行蘭嶼反對運動的新聞再現。而評論性與專題性的報導比較多會站在蘭嶼人觀點發言，發揮媒體伸張正義的職責。蘭嶼的原住民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海洋民族，與生態環境自然的和諧共存是達悟人早就學會的處世哲學，捕魚（如射魚、抓飛魚、釣鬼頭刀等）是生活所需、蛋白質的主要來源，大海就是達悟人的冰箱，餓了就下海採集食物，不需要、也從不會過渡捕撈，所以生態的意義與漢人動不動就以觀光、發展的想像是大為不同的，這樣的差異當然也反應在主流媒體的報導上。

《中時新聞網》與《聯合知識庫》的新聞常常以「經營民宿、浮潛、生態旅行」、「不輸綠島的自然風貌」，或描述「獨特文化與特殊自然資源，行政院評估國家公園」等觀點再現蘭嶼。這些報導仍然呈現官方、客觀的報導模式，常從觀光產業觀點報導，所提到的自然只是一種描述地方的形容詞，欠缺在地文化內涵的展現。《聯合知識庫》

一則由黃貴華撰寫的「蘭嶼之怒」系列報導專題之三「前程茫茫 雅美人寧可自己掌舵」（1993.05.05），提供了一個比較不同的報導方式，這是一個是從蘭嶼人角度進行客觀報導的專題，陳述「雅美族人必須砍樹、捕魚，依賴自然生活」。和前述兩項案例的分析相仿，雖然此類專題報導站在蘭嶼人的立場發聲，但畢竟不是蘭嶼人自己的發聲，所展現的文化深度與主體意識，仍有相當的差距。

達悟人自己的另類發聲一方面透過族群運動來維護原住民的生存權，是屬於種族運動。一方面反對核能與核廢料污染、同時強調自然生態之延續與保育的重要性，是環境運動的體現，所以蘭嶼的反對運動相當符合新社會運動的精神。如《蘭嶼原住民媒體資料庫》的一篇〈2002全體達悟族反核宣言〉（蘭嶼雙週刊，2002.05.19）內容，強調蘭嶼的生態環境是祖先給後代子孫所遺留的自然資源，這個報導最後提到：

為了我們的美麗家園
為了我們族人的生命安全
為了留給後代子孫祖先遺留下來的自然資源
我們全族不惜奮力一戰！

《蘭嶼雙週刊》刊登了一則由旅台蘭嶼人謝來玉的讀者投書內容，題目是〈文化生活與文明生活的再思〉（謝來玉，2001.05.27），內容摘要如下：

從我誕生的那一剎那直到十八歲末，離開蘭嶼時，我的生活有濃濃的傳統味。每一天彷彿就在文化的洗禮中成長著，我住過地下屋，經歷每一個重要的慶典，無論是飛魚祭祭典、大船下水典禮、傳統屋的落成，媽媽織衣我依偎看著，村莊相互幫忙的美德，母親在種芋頭及地瓜，父親在開墾或下海捕魚……文化的本質就是生活。族人用生命來保障傳統屋的價值性，於是完成建築一層地下屋時，屋主會用地瓜、芋頭，盛滿新屋，然後宴請所有親朋好友來共享。然而不幸的事，國民政府的一意孤行，全部拆除了所有的傳統屋，我還聽到老人家說，他們為

了阻止拆除他們的房子，當怪手來的時候，他們就躺在庭園裡誓死反對……有很多人類學者對達悟族人的研究寫道，達悟族人是一個知足、和善、純樸的民族。也許真是如此，我們在沒有防人之心的狀態中簽下了那個罐頭工廠的核能廢料儲存所在地，更可悲的事，我們用我們的生命當籌碼，來抵抗它的侵入……明顯的爾虞我詐非達悟人的手段，核廢料一日不除，將是蘭嶼島上永遠的惡夢。

這篇讀者投書呈現了蘭嶼文化傳統生活與自然環境的共生，地下屋不只是地下屋，還是達悟人賴以為繼的文化傳承，這篇文章抒發個人經驗與想法，與族群文化與傳承的論述相結合，同時也展現出另類媒體主動閱聽人的特性——主體發聲、分享訊息、以及參與建構反對運動論述。

肆、與主流媒體對話

Levo-Henriksson (2007: 55-59) 從北美洲 Hopi 印地安人的典型案例分析，媒體扮演著少數族群自我認同的建構者角色，這包括媒體的再現與圍繞著這些再現的少數族群概念。主流媒體扮演了建構族群邊界與類別的外在力量，與族群媒體相互發揮影響力。而透過自己的媒體與使用自己的語言，則是少數族群生存、保存文化與語言認同一個好的開始。因此除了運用像「蘭嶼雙週刊」的社區媒體、族群媒體之外，在反對運動中適當地運用主流媒體來協助族群形象的建立，也是不可忽視、不可逃避的重要議題。

一、另類媒體介入

夏曼藍波安提到：「媒體本身它是一個能見度的東西，記者扮演的角色本來就是要讓事情能夠被看見……媒體絕對有它的一個效益在那邊」（訪談記錄，2010.04.29）。Dreher (2010:144) 運用「社區媒體介入」(community media interventions) 的概念來說明「在媒體種族主義的脈絡下，社區針對主流新聞媒體所進行的反駁活動與計畫

……目的在影響並改變主流新聞的議題設定與再現」。蘭嶼反對運動的領袖之一，曾任縣議員的郭健平，在領導反核廢料與反國家公園的過程中，充分運用了「社區媒體介入」，他說：

因為在台灣〔待過〕，我的資訊反而比在地的人要豐富，對媒體的運作我比較清楚，所以每次要形成一個運動的時候，我就開始看，然後去聽大概的這幾個月台灣的政治經濟活動會是什麼。也許李登輝要到美國去康乃爾大學演講，那會佔去整個版面，特別是這個平面媒體的版面。一小搓蘭嶼的達悟人要去反核，你上不、你完全上不了〔版面〕，所以我會抓那個時機……台灣所有的〔大〕小眾媒體沒有特別議題的時候，我就會選那個時間做為我運動的時間，所以我們每一次都會上頭版。上頭版有一個很重要我的策略的原因是，讓台灣所有的人包括國際媒體，都看得到有一小搓的人、這麼少數的達悟人，為了他們的生存權在做鬥爭……我要確保這個運動，一定要讓台灣的媒體，把焦點集中起來。（郭良文，訪談記錄，2010.04.29）

張海嶼曾擔任蘭嶼民族議會籌備會發言人，率領族人遠度海峽到台北去抗議時，做好了各種發言的準備，懂得集中火力，口徑一致，吸引媒體注意與報導，具有相當強烈的媒體策略計畫，他說：

〔有關國家公園，台灣媒體〕報導都傾向這個地方來，所以應該是好的，所以應該我們都滿意他們的報導。蘭嶼的同胞能夠講話的很少……我們就分配誰是翻譯的，我們要去台北的話，這些老人要講什麼話，就是你的話的方向大概是這個，不要亂講，那如果說有亂講的話，那這個翻譯的人要隨時把他導正過來……所以有專門翻譯的，有專門跟他們溝通去跟他們對談的，分得很細，誰是要負責記者的部分，誰管飯啦、誰管票啦，都分得分常清楚……（郭良文，訪談記錄，2010.04.28）

1995年6月錄製的「蘭嶼雅美族赴台灣台北反核廢生存抗爭紀實」錄影帶，紀錄了達悟人從蘭嶼到台北所進行的抗爭，要求遷移核廢料廠、不要擴建壕溝。達悟人認為這是台灣政府的「滅族」舉動，會中郭健平不斷威脅要脫離台灣、獨立自治，或轉交聯合國進行管理。蘭嶼當地居民前往立法院和台電大樓舉行公聽會和記者會，表達了訴求。這次抗爭活動事後至少獲得了中視長達2分鐘、TVBS長達2分鐘15秒的電視新聞報導，以及各主流報紙的大幅報導，顯示媒體策略運用得當，成功搶佔了新聞時間與版面、吸引外界正視這件事情。

二、運用國際組織與尋求外力奧援

蘭嶼的反對運動在領導人的策略思維之下，積極結合外界的力量來蓄積運動能量。國際媒體的運用能創造國際輿論，進而對台灣政府施壓，是一個很好的媒體策略，也是蘭嶼達悟族人能夠以小博大的槓桿原理，結合國際 NGO 與國際媒體的力量，以原住民族的基本生存權為訴求，往往是得到國際支持力量的良好理由。郭健平提到：

國外媒體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發聲的管道……我去德國參加那個 Greenpeace 年度的一個活動的時候，我覺得他們反而比我們的聯合國還更有力量，而且那個實踐力更強，所以後來我就邀請英國 Greenpeace 的成員來蘭嶼作環境政策調查，然後那個報告也給了台電很大的壓力，但是我當然沒有透過他們的成員去發布消息，我說我們發布這個消息，但是你們要在歐洲發布，這樣…整個政治區域的平衡方面與跟國際媒體的圍剿，這樣台灣他才會稍微縮下來……（郭良文，訪談記錄，2010.04.29）

蘭嶼反對運動的結盟對象包括許多國內組織與人士，像是記者、大學教授、民意代表以及環保運動團體等等，這些合作對於反對運動經驗的學習有很大的幫助，盟友的助力常常無所不在，對運動的成敗有產生很大的影響力。郭健平說：「張國龍在還沒有組成環保聯盟之前就與我們有很多聯繫」（同上引）。大學教授中以台灣大學城鄉研

究所夏鑄九教授對運動方向的影響最大，夏鑄九教授曾經規劃過蘭嶼國家公園的計畫藍圖，所以跟當地的發展有許多關聯。郭建平說，

夏鑄九幫忙的才多哩，跟我在街頭裡面靜坐呀、抗爭呀，包括寫文章呀，包括下達我們的指令，他其實是我們後頭最大的軍師……覺得是要當地的人來參與這個國家公園，它才有生命力嘛，你總不能讓在地的文化變成是一個純觀光式的。哪你要維護，在地的人也最懂得這個在地的文化、在地的多樣性的這些生態呀、生活。（同上引）

當蘭嶼反對運動開展之後，當地人與一些政治人物也有許多接觸，尤其是反對黨的政治人物，有時會出面幫忙說話、提案，或協助召開公聽會，藉此擴大運動力量。如 1995 年 6 月 19 日至 6 月 21 日期間，達悟族人赴立法院進行反核廢抗爭，並在立法院召開公聽會，就是由當時民進黨立法委員翁金珠與葉菊蘭辦公室所協助舉辦。而蘭嶼人前往監察院陳情，則是在民進黨立法委員林濁水陪同下進行的。蘭嶼鄉公所、台東縣政府、以及部分原住民立法委員也對反核廢設置與反對國家公園設立提供許多助力，如發表宣言、聲援達悟族的反對運動。

伍、蘭嶼族群的另類發聲

另類媒體不只是有形的、外顯的傳播媒體，它還是各種型式的溝通工具與無形的、不明顯的表意活動。蘭嶼社區媒體的傳播文體種類頗多，有時甚至比主流媒體更具有滲透力，除了新聞報導與媒體評論這些比較正式的文體之外，族群媒體另外的一些發聲管道，往往與族群的獨特文化有密切關係。如透過文學作品、詩詞或蘭嶼獨有的歌謠吟唱等方式來分享訊息或鼓吹反抗思潮。或是透過部落口語傳播的模式，尤其是教會組織溝通與動員的力量，將反對運動的理念有效地傳播出去。

一、歌謠、詩與藝術作為另類媒體

蘭嶼達悟族歌謠是非常特殊的當地文化經典，由於歌謠是蘭嶼傳統生活中相當重要的一環，無論祭典、收穫、成年禮或平常接待訪客，達悟人都常常浸淫在各式各樣的歌謠當中。他們沒有樂器，僅以胸部喉嚨發出自由變化聲音來唱歌謠。達悟歌謠充份顯示出一種社會關係營造的功能，以及禮儀規範的實踐，已逐漸失傳，是有極高代表性的文化遺產。

由蘭嶼族人謝永泉在蘭嶼廣播電台所主持的「黑潮傳遞」節目，其中 2004 年 7 月 1 日第 37 集的內容，播出一位達悟耆老所唱的反對國家公園設置的歌謠。主持人謝永泉說，我們今天「特別要非常的介紹這個歌呢，是越過了我們傳統的歌詞，甚麼叫越過呢？就是他不是爲了蘭嶼某些事情而唱的歌，他是爲了反國家公園而唱的這個歌喔」。這是一位將近八十歲的耆老因爲去了台北參加反對國家公園抗爭活動，有感而發而進行的即興創作，這種歌謠的創作方式是運用蘭嶼獨特的傳統表達方式來進行的，非常具有地方文化意涵。

主持人謝永泉介紹這首反國家公園之歌，歌詞裡面所講的內容如下：

全島的所有居民，我們向你們非常的致謝，也向你們說聲抱歉，我們的任務可能沒有辦法去達成，致謝的部份是甚麼呢？因為你們每一個人都掏出不管一塊錢、十塊錢、一百塊錢，然後用這些錢呢，讓我們有費用可以到台灣去，到台灣去呢就是跟我們的政府那去談判，談判甚麼呢？就是為了國家公園，那我們這些去的人呢，因為膽子非常的小，我們面對那些大官，我們不曉得要說甚麼，我們在那裡就，呃，也說出我們反對的聲音跟我們全鄉居民的聲音，當然那些政府的官員都是比較高級官員，所以他們所講的也很有理由，但是我們也有反駁，那這樣的關係，我們回到我們自己的部落，告訴他們說我們在那裡所作的就是轉達了全鄉所有老百姓他們的意願，就是希望能夠，呃，不要在蘭嶼設立這個國家公園。（謝永泉，2004.07.01）

在 1995 年 6 月 19 日至 6 月 21 日期間，蘭嶼族人赴台北進行反核廢的抗爭活動，從「蘭嶼雅美族赴台灣台北反核廢生存抗爭紀實」的錄影帶中可以得知，蘭嶼歌謠在抗爭活動中也扮演了一個重要的角色。在台電說明會的活動中，在達悟人圍坐在抗議地點的水泥地上，就有耆老在吟唱歌謠。在立法院所舉辦的公聽會上，也看到達悟耆老用達悟語來吟唱即興創作的歌謠，在座的漢人官員及與會者雖然聽不懂歌詞內容，但蘭嶼人的文化力量卻已經透過傳統歌謠的吟唱直接展現了出來，這是一種主體性的宣示、一種文化自信的展現，一種典型的另類媒體傳播型式。由於現場也透過反對運動領袖郭健平進行翻譯，歌謠所表達的意念也間接的讓與會官員們知道。在台電說明會與立法院公聽會的發言台上，用自己的母語唱出獨特的歌謠內容，對於振奮蘭嶼族人士氣、凝聚抗議者的認同有很大助力。

文學與詩詞的創作，運用在反對運動當中，是一種對當權份子與主流文化的反動，一種寧靜的心靈革命。蘭嶼雙週刊在 1995 年刊登了以下這篇反核廢料設置在蘭嶼的詩（Manaik, 1995.06.25）：

萬能神啊！你親眼看到雅美族人受到的苦難

我們受到俗世智慧的欺瞞

被強權壓迫而渴望釋放

我們漸漸步入科技的死亡陷阱

慢慢接近文明的悲劇慘案

萬有神啊！我們的生存已被官僚漠視

盼望已被貪婪吞噬

.....

萬物神啊！我們不畏多數私慾的詭詐

不懼強權文化的剝削

不視既得利益的誘惑

不屈進化論調的迷盞

慈悲神啊！我們要的是與世無爭的安靜

.....

「通過堆疊兩旁核廢桶令人窒息的狹隘走道，從迎面而來的第一幅油畫『達悟的眼淚』開始，一幅幅展現蘭嶼土地與達悟族人飽受『惡靈』戕害的油彩作品一一呈現在眼前」（莊哲權，2000.08.06）。蘭嶼椰油部落青年畫家席·傑勒吉藍，綽號飛魚，在布農文教基金會台灣原住民藝術中心展出反核裝置藝術個展「金色年代」，用這個名詞是一種反諷。除了重建核廢場的場景做為裝置藝術外，也展出勇士的祈禱、沈默的陶壺、禁止進入、外婆的晚餐、何去何從等共計十幅油畫作品。這篇報導指出飛魚說：

在千禧年的今天，核廢料仍持續帶給蘭嶼這塊美麗的土地永無止境的悲歌，更是達悟人一個恐懼籠罩的未來。十三歲時，飛魚目睹了蘭嶼被迫接受第一批核廢料過程，當時地方還謠傳是要建魚罐頭工廠，讓達悟人有了美麗的憧憬，為了拆穿這個謊言，飛魚長期投入反核及原住民運動，同時也透過畫布及彩筆呈現出心靈的吶喊。（同上引）

這種藝術創作與展覽，和文學與詩詞的創作一樣，是另類媒體與發聲較不明顯的一種型式，運用在反對運動當中，展現了文學與藝術創作的力量，反應出創作者心中的吶喊、以及突顯出前衛藝術型式的對話與傳播。

二、教會的組織傳播與親身傳播力量

有關核廢料觀念的教育、募款的發起、爭取外界聲援、以及抗爭運動的動員，許多都是從教會發動起。蘭嶼自從 40 年前由瑞士籍傳教士紀守常神父引進蘭嶼，基督教與天主教就逐漸成為島上族人最主要的宗教信仰，幾乎是高達八九成的達悟人現在所信仰的宗教。因此，教會的影響力很大，神父、牧師、或傳道人扮演了重要的意見領袖，教會裡面的組織力量與親身傳播過程，在反對運動過程發揮了很大的影響力。張海嶼牧師回憶說：

當時台電要做這個的時候，他是騙當地的百姓說這是要做罐頭工廠，再不然就是軍港，大概就是用這些來行騙……最後這都不是事實，而且我們看到好多負面的，那所以我們就開始在教會裡面這些傳道人開始來談，那時候郭健平還是在傳道的工作上，所以我們常常在一起，常常在聊天，於是我們說試試看來反……然後請各村的村長、耆老、還有教會就是天主教的大家一起來談……我們要怎麼把這個廢料轉換成我們的語言，核廢料是高科技的語言，你跟你的阿嬤也講不清楚什麼叫做核廢料，所以我們後來就把核廢料這個東西把它轉換成是毒藥……我們就跟老人說這個國家要把毒藥放在蘭嶼，那毒藥他們知道會毒死人，我們有人在毒魚，這個毒魚會死。所以這個一聽到說毒藥要到蘭嶼來，那這個不得了了，全島的同胞都共同的激憤。（郭良文，訪談記錄，2010.04.29）

小時候信仰天主教的運動領袖的夏曼藍波安說，在蘭嶼反核廢料與反國家公園的抗爭活動中，「基督教動員與宣傳的力量很好」（同上引）。教會的角色在蘭嶼確實是有相當大的影響力，蘭嶼反對運動者如張海嶼、董森永、與周定頌等人都是基督長老教會的牧師，郭健平在當時也是教會的傳道，他們都接受了「玉山神學院」的正式教育訓練。基督長老教會在蘭嶼發起反核廢料運動，邀請島上天主教教會一起參與，獲得了很大迴響，也促成了宗教傳播在蘭嶼反對運動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陸、結語：另類媒體、族群反霸權與市民社會的發展

無論是反核廢料或反對國家公園的設置，都是「雅美少數民族在抗議蘭嶼在依賴台灣發展的過程中所引起的邊陲民族危機」（夏鑄九、陳志梧，1988：234）。由於被納入以國家主義為核心的台灣資本主義的經濟體系，所以市場競爭、勞動力商品化、現代化、漢化以及觀光價值推廣等概念滲透入達悟族社會之中，漸漸改變了傳統社會中自給自足、與大自然共生的生存模式，進而創造出蘭嶼社會結構的矛盾與危機。

國家公園的設置與島嶼開發、觀光效益的考量息息相關，這也可以被視為是一種商業邏輯。核廢料的背後則充斥著現代文明所需的工業電力與國家經濟發展的意識型態，既是政治、也是商業。蘭嶼反對運動，抗拒此兩種力量的入侵，求的是族群文化生存權、主體性，是市民社會力量的展現，而主流媒體的報導總是受到所謂「客觀中立化」的影響，只報導發生了什麼事，卻很少真正能從當事人的角度來進行更深入的報導。主流社會的偏見也常常再現於媒體報導之中。夏曼藍波安指出：

在 1982 年、1981 年，所有的從新新聞或時報週刊……反正很多、所有的雜誌，從民國 69 年開始運土，開始動工到運土，全部都把藍嶼形容的就是惡魔島、窮鄉僻壤，諸如此類的……形容到徹底的不好。所以核能核廢料儲存在蘭嶼，它就有它的一個合理性的角度，所有的媒體全部都是這樣子寫的，恨得要命，這些媒體……當時的台灣所有的記者，寫得都是一個運動的過程，從理論上、從知識上、從整個全球化的角度來去看，都還沒有那個能力去書寫一個論述，蘭嶼的民族運動或是台灣的民族運動……〔這些報導〕可以閱讀，但思考性不夠。（郭良文，訪談記錄，2010.04.29）

主流媒體也往往便宜行事，未能深入瞭解當地文化風俗或查核事實，因此很容易被有策略的運動者牽著鼻子走。郭健平認為「報導不深入的媒體太多了、非常多」，他指出：

我自己看台灣的媒體，我覺得有一種盲目性……如果非常清楚怎麼操縱〔這個媒體的話〕，它會跟著走，完全無意識，我覺得很有趣，非常有趣，完全沒有判斷跟思考，然後整個語詞、用詞、遣詞，那個文字的敘述與報導，實在是非常……（笑），我覺得這個非常好玩……〔記者在上面〕被耍弄，是非常有趣的一個事情（同上引）。

不過，正如 Hooks 所言：

邊陲正是生產反霸權論述的核心，不僅是言論上，亦在於存在習性與生活方式上的論述……指涉邊陲並不意味著將因為移往核心而離棄她，而是留在裡頭，親近她，因為她滋養我們抵抗的能力，提供我們可以看見、創造和想像出另一種新世界的激進觀點。（汪明輝，1999，轉引自 Hooks, 1990: 149-152）

這個說法很能夠反應原住民的社會位置，透過另類媒體的發展與運用，建立主體性、進行反霸權（counterhegemony）。這也呼應了 Ndlela（2010: 94）的主張，由於主流媒體被政府控制與支配，另類媒體具有葛蘭西（Gramsci）的反霸權意涵。另類媒體得以建構出獨立的另類傳播空間，成為民主運動者的鼓吹平台，以及跨國性民主催生的社會運動，是一種另類公共領域。Vatikiotis（2010: 37）說：「相關媒體實踐的反叛特性，是地方形塑政治意識，作為反面資訊的提供、或作為一種發展權力的代言者，進而形成大眾反抗文化」，他認為公民的媒體參與建立在公共空間與公共領域的概念之上，且具備了民主過程的實踐意義。這種公共性，免除政治與市場力量的夾殺，所發展出來的健全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則扮演了延續另類媒體存在的角色（Lewis, 1993）。社區媒體鼓勵參與、形成培力，是對抗不當政治權力，並且維護族群文化認同的重要工具。

另類媒體的型式是多元的，以本文所研究的內容來看，從報刊、影像紀錄、與廣播電台等傳播媒體，示威抗爭活動的中介與大眾媒體的報導，到傳統歌謠、文學詩詞與藝術品創作等，都是建構反抗文化、散播思想的另類發聲工具。實際上，若依據 Downing（2001）所分析的激進另類媒體所涵蓋的範圍，那就更廣泛地包含報紙、廣播、電影、影像紀錄、激進網路使用、藝術美學、公眾演講、舞蹈、笑話、歌曲、流行劇場、街頭劇場、表演藝術、宣傳單、手冊、海報等。

本文在前段開始時，就曾針對另類媒體做了一個綜合定義。至於另類媒體的理論分析意涵，則可以分成三個層面來加以剖析：另類媒體的使用者、另類媒體的運用方法、以及另類媒體的目的。

表 6：從三層面看另類媒體的理論意涵

層面	型態	理論意涵
另類媒體的使用者	積極參與者、非常主動閱聽人	非主流、草根運動
另類媒體的運用方法	媒體傳播、文藝傳播、示威傳播	直接／間接媒介作為的滲透與擴散的中介、身體即媒介
另類媒體的目的	意識覺醒、賦權、反霸權	新社會運動、民主化、市民社會（含跨國性市民社會）

從另類媒體的使用者來看，是一種積極的參與者、非常主動的閱聽人，如少數族群或特定群體組織的成員。理論意涵所關聯的是一種非主流的行動者，是公民而非消費者。是一種草根（grassroots）運動，通常由下而上，不包含由執政黨或資本家所發動的參與活動或示威遊行。就另類媒體的運用方法而言，包括三種類型：(1) 媒體傳播，即社區廣播電視、社區報、公民影像記錄、網際網路等媒介；(2) 文藝傳播，即歌謠、詩詞、文學與藝術作品等媒介；(3) 示威傳播，即集體行動、行動劇、記者會、公聽會，製造大眾傳播效果的示威或抗爭行動。理論意涵與「直接／間接媒介」作為的滲透與擴散的中介、以及「身體即媒介」的概念涵蓋示威即傳播的概念。最後，就另類媒體的目的來看，主要重點是在另類媒體使用者的意識覺醒、培力與反霸權（包括反政治、經濟、文化、種族與性別霸權）等面向，以促進政治民主、階級平等、與文化多元。因此，這部分的理論意涵則包括新社會運動、民主化、市民社會、與跨國性市民社會的發展。

註釋

- [1] 蘭嶼雙週刊的版面分為四版：新聞版（一、四版）、文化版（二版）、知識版（三版）；新聞版內容包括蘭嶼地方新聞、旅台動態、鄉音、政令宣導、人物專訪，文化版為雅美傳說、歌謠、風俗、蘭嶼文學及青少年創作園地，知識版主要提供健康、農漁業、法律、勞工專欄、蘭嶼生態等資訊。
- [2] 為確保本研究蒐集到的資料品質佳、相關性高，因此檢索過程的要求亦嚴謹，重複或不直接相關的內容一律都加以剔除。譬

如，核廢料非直接相關新聞主要包含三大類：(1) 其他地方的核廢料場爭議（如台東縣、台北縣），內文中僅稍微提到蘭嶼；(2) 旅遊報導，新聞主要內容為蘭嶼旅遊景點介紹與行程說明等等，核廢料場僅是提到的景點；(3) 明星花邊，這類的明星花邊主要是蘭嶼歌手陳建年與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的相關新聞，內文提到的核廢料場僅是點綴。此外，在「蘭嶼原住民媒體資料庫」中搜尋「國家公園」為關鍵字的資料，共搜尋到 123 筆。但其中有 54 篇並非與蘭嶼設立國家公園爭議直接相關，例如內容為玉山國家公園在蘭嶼招募導覽志工等，這類報導都在檢索過程中予以排除。

參考書目

- 王嵩音（1998）。〈原住民議題與新聞再現：以蘭嶼核廢料場抗爭為例〉，《台大新聞論壇》，5：111-136。
- 中時新聞網。台北市：中時旺旺集團。網址：http://tol.chinatimes.com/CT_NS/ctsearch.aspx
- 中國時報社論（2002.05.05）。〈除了遷移，別無選擇〉。上網日期：2010年3月15日，取自「中時新聞網」http://tol.chinatimes.com/CT_NS/ctsearch.aspx
- 汪明輝（1999）。〈台灣原住民民族主義的空間性〉，《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報告》，31：83-100。
- 成露茜（2004.04.11）。〈與大師對談〉公共電視發言內容。台北市：公共電視。
- 李宗祐（1999.07.05）。〈蘭嶼核廢料貯存場面臨變局：台電九月底前若無遷場計畫及回饋措施 鄉公所將拒審租地申請〉。上網日期：2010年3月15日，取自「中時新聞網」http://tol.chinatimes.com/CT_NS/ctsearch.aspx
- 胡文輝、高鴻飛（1993.04.18）。〈鄉土情懷系列續篇 雅美悲歌 伸出優越感援手 加深雅美人困境〉。上網日期：2010年3月15日，取自「聯合知識庫」<http://udndata.com/>
- 莊哲權（2000.08.06）。〈蘭嶼青年畫家飛魚反核裝置藝術個展反諷「金色年代」〉。上網日期：2010年3月15日，取自「中時新聞網」http://tol.chinatimes.com/CT_NS/ctsearch.aspx
- 夏鑄九、陳志梧（1988）。〈臺灣的經濟發展，蘭嶼的社會構造與國家公園的空間角色〉，《台灣社會研究》，1（4）：223-246。
- 黃貴華（1993.05.05）。〈「蘭嶼之怒」系列報導之三：前程茫茫 雅美人寧可自己掌舵〉。上網日期：2010年3月15日，取自「聯合知識庫」<http://udndata.com/>
- 曹銘宗（2002.06.06）。〈達悟反核軍師：打造蘭嶼為明珠 夏曼藍波安認為蘭嶼應回歸「人之島」營造成具世界級的原住民自治區〉。上網日期：2010年3月15日，取自「聯合知識庫」<http://udndata.com/>
- 彭奕峰（1996.04.28）。〈蘭嶼築人牆 拒絕核廢料上岸〉。上網日期：2010年3月15日，取自「中時新聞網」<http://tol.chinatimes.com/>

CT_NS/ctsearch.aspx

謝永泉 (2004.07.01)。〈蘭嶼天主教教父(一)〉，《黑潮傳遞》，37。上網日期：2010年6月20日，取自「蘭嶼原住民媒體資料庫」<http://lanyu.nctu.edu.tw/database/lanyu/index/index.aspx>

謝來玉 (2001.05.27)。〈文化生活與文明生活的再思〉，《蘭嶼雙週刊》，292。上網日期：2010年6月15日，取自「蘭嶼原住民媒體資料庫」<http://lanyu.nctu.edu.tw/database/lanyu/index/index.aspx>

聯合知識庫。台北市：聯合報業集團。網址：<http://udndata.com/>

蘭恩文教基金會 (2003.01.01)。蘭嶼反核遊行【影片】。上網日期：2010年6月15日，取自「蘭嶼原住民媒體資料庫」<http://lanyu.nctu.edu.tw/database/lanyu/index/index.aspx>

蘭嶼民族議會 (2002.12.31)。〈蘭嶼民族議會聯合聲明〉，《蘭嶼雙週刊》，312。上網日期：2010年6月15日，取自「蘭嶼原住民媒體資料庫」<http://lanyu.nctu.edu.tw/database/lanyu/index/index.aspx>

蘭嶼原住民媒體數位典藏資料庫。新竹市：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網址：<http://lanyu.nctu.edu.tw/database/lanyu/index/index.aspx>

蘭嶼雙週刊。蘭嶼：蘭恩文教基金會。

蘭嶼雙週刊 (2002.05.19)。〈2002全體達悟族反核宣言〉，《蘭嶼雙週刊》，303。上網日期：2010年6月20日，取自「蘭嶼原住民媒體資料庫」<http://lanyu.nctu.edu.tw/database/lanyu/index/index.aspx>

蘭嶼雙週刊 (1995.06.11)。〈雅美人發出怒吼抗議核廢壕溝增建 要求台電信守承諾尊重鄉民生存權〉，《蘭嶼雙週刊》，177。上網日期：2010年6月20日，取自「蘭嶼原住民媒體資料庫」<http://lanyu.nctu.edu.tw/database/lanyu/index/index.aspx>

蘭嶼雙週刊 (1995.07.23)。〈雅美長老赴台陳情旅費 各界團體熱心贊助〉，《蘭嶼雙週刊》，180。上網日期：2010年6月20日，取自「蘭嶼原住民媒體資料庫」<http://lanyu.nctu.edu.tw/database/lanyu/index/index.aspx>

Avison, S. & Meadows, M. (2000). Speaking and hearing: Newspapers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Canada and Australia.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5(3), 239-260.

Carpentier, N., Lie, R. & Servaes, J. (2003). Community media: Muting the democratic media discourse? *Journal of Media & Cultural Studies*,

17(1), 51-68.

- Downing, J. (2001). *Radical media: Rebellious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movements*. Longon: Sage.
- Dreher, T. (2010). Media interventions in radicalized communities. In K. Howley (Ed.), *Understanding community media* (pp. 143-150). London: Sage.
- Fontes, C. (2010). The global turn of the alternative media movement. In K. Howley (Ed.), *Understanding community media* (pp. 381-390). London: Sage.
- Hooks, B. (1990). *Yearning: Race, gender and cultural politics*. Boston: South End Press.
- Levo-Henriksson, R. (2007). Media as constructor of ethnic minority identity: A native American case study. In L. K. Fuller (Ed.), *Community media: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pp. 55-65).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Lewis, P. (1993). Introduction. In P. Lewis (Ed.), *Alternative media: Linking global and local* (pp.11-28). Paris: UNESCO.
- Manaik (1995.06.25)。〈反核人士的禱告〉，《蘭嶼雙週刊》第 178 期。上網日期：2010 年 6 月 15 日，取自「蘭嶼原住民媒體資料庫」<http://lanyu.nctu.edu.tw/database/lanyu/index/index.aspx>
- Meadows, M., Forde, S., Ewart, J., & Foxwell, K. (2009). Making good sense: Transformative processes in community journalism. *Journalism*, 10(2), 155-170.
- Ndlela, N. M. (2010). Alternative media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Zimbabwe. In K. Howley (Ed.), *Understanding community media* (pp. 87-95). London: Sage.
- Pietikäinen, S. (2008). Broadcasting indigenous voices: Sami minority media produc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3(2), 173-191.
- Misiva, S. (1999.02.28)。〈詛咒惡靈的省思〉，《蘭嶼雙週刊》第 254 期。上網日期：2010 年 6 月 15 日，取自「蘭嶼原住民媒體資料庫」<http://lanyu.nctu.edu.tw/database/lanyu/index/index.aspx>
- Vatikiotis, P. (2010). Democratic potentials of citizens' media practices. In K. Howley (Ed.), *Understanding community media* (pp. 32-40). London: Sage.

Alternative Media and Voices on Orchid Island: A Case Study of Opposition Movements to Nuclear Waste Storage and National Parks

Liangwen Kuo*

Abstract

This study proposes an integrated definition of alternative media involving the use of media access, active audience, citizen participation, multiple channels, consciousness raising, counter mainstream media, oppositional culture, subjectivity of minority groups, civil society, and democratization. For the literature review, we used Cheng (2004), Carpentier et al (2003), Fontes (2010), and Downing (2001). Our research method included data from interviews and media content. Our study includes anti-nuclear and anti national park voices and perspectives that deals with the intentions and strategies of the leaders of these movements to create media campaigns, ally with outside supporters, and producing promotional content via mass media reporting.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lucidate the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of alternative media by analyzing the methods of users and their purposes for utilizing alternative media.

Keywords: alternative media, civil society, community media, The Orchid Island, Lanyu, Tao, Yami

*Liangwen Kuo is Professor at the Institute of Communication Studi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Hsinchu, Taiwan.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記成露茜教授(1939-2010)的中國新聞史研究

Notes on Lucie Cheng's (1939-2010) Research of Chinese Journalism History

doi:10.6195/cjcr.2010.17.04

中華傳播學刊, (17), 2010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7), 2010

作者/Author：夏春祥(Chun-Hsiang Hsia);唐志宏(Chih-Hung Tong);李明哲(Ming-Che Lee)

頁數/Page：75-91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0/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195/cjcr.2010.17.04>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記成露茜教授（1939-2010） 的中國新聞史研究

夏春祥、唐志宏、李明哲*

摘要

這篇文章記述成露茜比較少為人知悉、在中國新聞史上的各種努力，尤其是對新聞史研究的看法。那種源於對父親成舍我先生的孺慕與追思，進而試圖釐清她在近代史上的定位，型塑出 Lucie 在二十一世紀對於新聞史研究的熱切動力；只是，她在世新大學成立舍我紀念館、架設網站，以及出版文集之餘，念茲在茲的更是新聞史研究領域的經營與開拓，試圖深化舍我先生在新聞教育與學術研究上的影響，這包括了與國外學者共同討論近代報業與報人、到科技大學談論人文型研究室的開設，以及邀請世界各地的青年學者來台進行新聞史領域的博士後研究等等。各自獨立的不同篇章均指出：Lucie 倡導社會文化取向的新聞史研究，或可呼應西方史學思潮中新文化史的作法，亦即從更大的範圍來看待新聞實踐的種種。只是，有別於近來大量文學、史學，以致於政治學的文獻是將報業視為資料來源的作法，Lucie 堅持以新聞活動本身做為研究主體，進而試圖重建那個動盪不安，卻又影響深遠的民國初年，以及釐清從當時發展至今、備受注目卻始終爭議未減的新聞報業。

關鍵詞：成露茜、中國新聞史、成舍我、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新文化史

* 夏春祥為世新大學口語傳播學系副教授，唐志宏為建國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李明哲為世新大學新聞學系助理教授；他們三人目前均為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暨中國新聞史研究中心協同研究員。通訊作者為夏春祥，E-mail: chhsia@cc.shu.edu.tw。

Lucie 方走。幫她誦經祈禱時紙灰飛揚、朔風凜冽的情景還歷歷在目，但從當初至今，屈指數來也近五個月了。這些時日以來，我們的心情仍未平復；只是有過的承諾未敢或忘，或是發表，或是研討，或是交流，以致後續種種，只能盡力完成本分應為之事，但求無愧於與 Lucie 相交之誼與師生之情。一直沒有機會表達對她的感思、懷念，更謝謝學刊主編、客座主編與執行編輯在追思成露茜教授上的用心與巧思；全文是由原先單獨成篇的三段文字組合而成，分別由不同個人所撰寫，但最後是在客座主編建議下，由作者們統籌完成，以記述我們與 Lucie 在新聞史研究上的各種因緣。

壹、Lucie 鮮為人知的新聞史研究（夏春祥撰）

一般來說，提到 Lucie 總會想到她在社會運動與另類媒體上的努力。前者是醞釀她種種思索的背景，那個來自波瀾壯闊、爭取權益的 1960 年代，而這也是 Lucie 面對生活的一種方式；後者則是她延續關懷、平等的基進精神，試圖經營出更公平社會的重要體認，畢竟想法的釐清需要平台，不同的意見交流也需要媒介，更關鍵的是：她想讓更多沒有發聲的人用自己的形式說話。^[1] 只是，這一切一切的行為都不是種義憤填膺式的衝動與蠻幹，她總是能以一種精確、創新的學術態度，與充滿寬容理念的優雅姿態切入，關鍵在於她深切地理解，也堅定地探索學術研究的積極價值：在行動之前的考慮清楚，與在行動過程中的不斷反省、思索，以及評估。

然而在這篇文章裡，我想記述的卻是 Lucie 較少為人知悉、在中國新聞史上的各種努力，尤其是對新聞史研究的看法，而這也是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她的兩個核心關懷之一，另一則是另類媒體。當然一如過往經驗，這樣的行動也有其實際基礎，譬如她在 2000 年以後對《傳記文學》雜誌的接觸與經營，以及在 2006 年創辦《舍我紀念館》，繼而召喚一批人從不同面向為民國初年的新聞史研究奠定基礎，這包括了現在擔任世新大學校長、其時為教務長的賴鼎銘、數位典藏的莊道明、社會運動的黃德北、中國研究的羅曉南與溫洽溢、史學領域的李明哲與唐志宏、新聞傳播的黃玲媚、林富美、夏春祥、余陽洲與一批世新大學傳研所博士班的學生等。

基本上，Lucie 對歷史研究並不陌生，或更精確來說，她始終有著寬闊的歷史視野，畢竟在美國主流社會裡，要替少數族裔、婦女、移民等議題開拓被注意、被討論，以致於實踐空間，沒有一個獨特的時間縱深，是難以成其事功；1978 年，她便曾提出南加州華人口述歷史的計畫（鄭舒蘭，2010）。大概是在世紀之交、政黨第一次輪替的前後，Lucie 曾問我對於新聞史研究有何看法，畢竟這是我的長期關注自然興趣濃厚，但在台灣社會開展不易；她認為這是個很值得發展的領域，所描繪出的豐富願景也讓人動容、驚嘆。

當然，在二十世紀末，台灣社會已經少有新聞史研究直接探索報人、報社與新聞工作，^[2]比較多的是呼籲大家重視新聞史的後設（meta-）類型的探索，例如：彭家發（1996）與潘家慶（1997）等，或是主張從傳播史的角度進行探索，如夏春祥（1995，1998）等。2000 年之後，中華傳播學會發起人的陳世敏教授便有感於歷史研究的匱乏與價值，因此召集了傳播史讀書小組，推廣相關研究，並由個人負責實際事務；在 2001 年 26 期的《傳播研究簡訊》中，有多篇研究紀要^[3]發表、2002 年 3 月也舉辦《傳播史該怎麼教》的教學討論會，以及同年 7 月 5 日舉辦《傳播史與台灣社會：文化視野下的傳播事業》的論文發表會等，而小組成員之一的林麗雲（1999，2001，2003，2004）更有一系列的論文，甚且以專書形式討論著新聞史與傳播研究的相關問題。除了這些零星的努力之外，更多與新聞史有關的真實情況是許多傳媒組織均關注紀錄自身發展的軌跡，不過多是選擇性的篩選與過濾，能夠實在面對不同意見的學術嚴謹性不足。

在當時的探索中，傳統新聞史的編年記事常使得新聞與報紙成為政治力量的佐證工具，傳媒本身的內在價值反而被忽略了，因此研究文獻上多是記載某報何時發行、何時結束，又何時為誰所擁有等，而評估與否的判斷標準，則多在於政治面向的各種因素。若將這類文獻稱之為新聞史中的政治取徑，^[4]後來的研究面對這種侷限則做出不同調整，一是社會史／心理史的作法，試圖藉由傳播媒體上的報導文本，重建出過往特定階段的社會脈絡或當事人的心路歷程；另一個則是文化史的觀點，將當代社會的重要關懷發展成更加深刻的問題意識，藉以從過往歷史中找出面對社會結構的能動性資源。在 2003 年

以後，傳播史讀書小組便沒有後續活動，只是在這些摸索中浮現的分類方法，對於後續的關注者也有著影響；Lucie 對於這分類所揭示出的可能性，統稱為社會文化史^[5]的作法感到興趣，也同意只有將所關懷的過去不斷討論、持續交流以致於出版，更具體的觀點才會在歷史視野裡浮現。

爾後，自己任教的系所課程繁重，Lucie 也忙於社發所的所務，下次再談這個主題時，已是她擔任傳播學院院長之職。有回 Lucie 找我談話，要我參與學院課程改革委員會，我想個人只是助理教授，不知能幫上什麼？Lucie 卻要我積極一點，我說：好阿，會盡力而為，只是教學負擔實在太大；她笑著與我交換意見，並指出她自己不參加無謂應酬，就為了把時間花在最關心的事情上面。後來，我負責了一門必修課程《傳播與文化》的規劃，就把文化行動的歷史視野視為是課程重點之一。

2005 年，Lucie 一邊忙於國際媒體與傳播研究學會在台灣所召開的年會，^[6] 另一邊則積極安排世新大學傳研所博士班與社發所碩士班的相關課程，以深化學校發展。當時，兩個部分都邀請了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 Douglas Kellner；前者由他進行專題演說，^[7] 後者則是由他進行一系列課程的講授，並擔任一場公開講座的主講人，題目則是「文化研究與媒體奇觀：掌握美國政治中從 2004 年大選到卡崔娜與瑞塔颶風的關鍵契機」。在這個部分，Lucie 找我一齊參與課程與談，並負責翻譯 Kellner 的公開講座文章，我答應了翻譯，卻因為大學部的學分眾多不敢貿然接手博士班的課程與談，只是在過程中，我更加明瞭了歷史與哲學的關連，也更加清楚地掌握到學術研究在 Lucie 實踐中的作用；換句話說，歷史視野的培養與形成，得要仰仗互動過程中一系列問題的不斷提出，這種對事件肇因與發展脈絡的理性考察，又與生活經驗的感性體認有著密切關連。

後來我們有更多的互動，卻不是在她傳播學院院長任內，反倒是在 Lucie 創辦舍我紀念館，提出新聞史研究的重點學門計畫之際；當時便負責撰寫相關想法，並參與社會發展研究所黃德北所長與幾位老師的共同規劃。從那時起，這樣的討論關係就持續至今；記得有次問她，為什麼想要推動新聞史研究？Lucie 說她在整理家族資料，與舍我先生

檔案時，常常有著好奇：在中國近代史，特別是在新聞史上，舍我先生的定位是什麼？另外，Lucie 在生活中也常會看到、聽到一些講她父親的文章或研究，卻發現誤解不少或泛泛空談；她於是想藉由傳播學與史學的結合，重新釐清這樣的問題意識。

就基於這樣的關懷與信念，紀念館不僅將成舍我的行誼、事蹟整理出來，包括了他所寫文章的具體內容，以及所辦報紙的實際版面等；Lucie 也以各種方式倡導社會文化取向的新聞史研究，亦即從一個更大的範圍來看待新聞實踐的種種。換句話說，如果「定位成舍我」是 Lucie 進行新聞史研究的出發點，那麼「闡明新聞實踐」與「重建社會脈絡」等學術研究的具體目標，便成為她在紀念館成立同時念茲在茲的事情。近日關注新聞史的研究者愈來愈多，只是學者們多是來自文學、歷史、政治、語言等領域，因此常將新聞報紙上的記載與報導，視為是研究資料的來源，而非研究主題本身；Lucie 卻堅持應該將這些新聞實踐的活動，視為是主體，以進行更加深入的考察。在這樣的背景下，「重建社會脈絡」非常重要，但是確立專業優先性的「闡明新聞實踐」才是關鍵樞紐，也是當務之急。

在例行性的討論過程中，Lucie 經常提到一篇文獻〈輿論家的態度與修養——作為北大學生的成舍我〉（陳平原，1998），並視為是比較完整地呈現出社會文化樣貌的新聞史作品。在這篇文章中，作者首先透過五四運動的重新耙梳，指出蔡元培、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等人的作用，並揭示出在這場新青年運動中大學生成舍我的經歷；這種既寫個人事蹟，又旁及社會脈動的作法，很值得後來者參酌。文中的推論主軸從輿論家、北大新聞學研究會、新知編譯社、新知書社到新聞事業的理想內涵，將成舍我從 1918 年寫到 1921 年。文末寫道：

成舍我日後以報人及新聞教育家著稱於世，早年的意氣風發，以及大學階段的文化運動三大計畫，不大為人所知。重提舊事，一來便於理解成君日後的發展，二來展現北大校園的風采，三來為解讀五四新聞化運動提供一種新的方法——大學生的視角。（陳平原，1998：98）

陳平原的作法清晰地將青年成舍我與他未來在新聞報業上的作為描繪出來，這種讓模糊感受變為具體論述的作法，一直也成為後續新聞史研究的發展基礎。然而，在台灣推動新聞史研究的阻礙實在不少，畢竟這是個已經沒落的領域，相關人力相當短缺，於是 Lucie 說服世新大學校方，每年提供經費讓校內博士生撰寫新聞史相關論文，也進一步提供兩位博士後研究的機會給全球新聞史研究者申請。這種不僅注意研究品質，更能從外部環境營造新聞史研究發展的制度性基礎，這種靈活、主動又具建設性的公共作為，實是學者在處理行政工作時的具體典範：為學術服務，以啓蒙理性為依歸。

就在這種積極任事、蓬勃發展的過程裡，來自美國佛羅里達大學非洲與亞洲語文學系的 Carlos Rojas、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研究民初報人邵飄萍的 Timothy Weston 等，以及來自中國大陸幾個不同重點學校的學者，如湖南大學的唐海江、南開大學的侯杰、中國傳媒大學的李磊、南京師範大學的張曉鋒，吉林大學的程麗紅，以及人民大學的陳繼靜等所構成的博士後研究人力，都為紀念館所關注的中國新聞史與成舍我，做出不同面向的貢獻。

而這幾年，Lucie 與美國加州大學（UCLA）的葉文心、哈佛大學的周成蔭（Eileen Cheng-yin Chow）在美國所辦的新聞史工作坊，也成了她經營新聞史志業的一個動力來源。目前，她的幾個學生除了已經畢業並任教於世新新聞系的李明哲、還有論文中也體現歷史視野、任教於交通大學的林照真之外，新近畢業的學生如關心新聞工作主體——記者角色的黃順星，也在日前成為紀念館的助理研究員，還未畢業、卻也在新聞史領域中摸索的，則有計畫探索版面編輯的葉思吟、關心 1940 年代台灣媒體報人的邱家宜，以及研究星、馬華人新聞媒體的黃國富等。Lucie 關於舍我紀念館的志業將會有著什麼樣的變化？她所關注的新聞史研究，未來又會如何展現？都是我們所關注的發展。而在 2010 年 5 月 28 日舉辦的「新聞典範的挑戰與另類媒體：紀念成露茜教授國際學術研討會」，則是我們對她的致意與紀念，也希望這是新聞史研究再一次開拓的起點。

貳、掛黑牌機關搞新聞史研究（唐志宏撰）

Lucie 老師溘然長逝，至今快五個月了。我點閱了與老師相識以來，近六年歲月裡，兩百多封我們師生往返的郵件，最後一封是我寄發給她申請國科會計畫副本，請老師審閱。老師的回函裡沒有隻字論及國科會計畫，僅寫道：「近日和葉文心吃飯，我們談得非常愉快。他居然把新聞、傳播史列入柏克萊加大中國研究中心的重點項目，對我們的研究也很感興趣。我向他推薦你，希望有機會介紹你們談談」（成露茜，電子郵件，2009.12.11）。言下之意，是老師又有更高遠的想法，又要賦予我們更重的研究課題。然後訂在今年 1 月 15 日約我和明哲開會，這個會老師永遠都沒到場了。

回想這近六年的歲月，初始是我的好友明哲說他的老師想架個網站，專門要弄新聞史研究，我領域正好符合，希望我來和老師開個會。那時我主要的研究集中在晚清官報及晚清報刊文體，對成舍我這個人基本上是不熟悉，甚至十分陌生，只知他是位實踐性格很強的報人。明哲也僅說他的老師是傳播學院的院長，我乍聽之餘，第一個想法是傳播學院竟然有人要搞這麼冷門的研究，這個人真有趣。直到當天下午，會議開始進行時，我才知道成舍我原來就是 Lucie 老師的父親。

Lucie 先商請世新借出傳院地下室一個小房間當研究室，她說我們這是掛黑牌機關搞新聞史研究，客氣地問我和明哲研究環境條件夠不夠？我和明哲都是早年曾在《PC home》雜誌工作，職場的磨練下，基本上物質條件對我們本來就影響不大，明哲老說他愛土八路的作戰方式，蜘蛛網清一清，書籍排一排，就上陣搞研究了。這一點倒和老師的習性很像，他個人也不怎要求多高的物質條件，總說左派搞法，精神層面凌駕於物質需求。我因為專任的大學在中部，南來北往地，一周一次北上，每回上台北爲了要省下住宿費用，常是在這個黑牌研究室渡過漫漫的長夜。經過兩三年，總算把成舍我的資料慢慢的整建出輪廓。那時給我印象最深地，就是在午夜時分，我出來傳院大門口透透氣時，老師的辦公室總是燈火通明。老師這麼用功，我和明哲也就不敢提任何的辛苦，兩個人就這樣陪著她走了快六年的時間。

一開始 Lucie 老師先確立她對新聞史見解的根本，也就是編年史的寫作方式，史料排比重於背景分析，是否得宜？如果報刊上的史料，僅能做為文本分析，是否會忽略了文本背後的意義？如果文本的產製過程有意義，那麼要用什麼方法去分析這個意義？產製過程究竟又如何影響報紙的各個層面？比方規格形式、欄目設置、組織整建、報紙態度等等。基本見解提出後，她進一步將之用在成舍我的研究議題上。她說如果成舍我在新聞史是重要人物，那麼成舍我到底是留下那些別具一幟的特殊性，這個特殊性是他獨有的、或是別人也有的。如果是獨有的，那麼他別具一幟的特殊性要如何去論述呢？

這些議題對我而言，在過往的研究工作上，等於是投下了震撼彈。我在政大接受很多史料分析課程，也接觸很多新聞史的論著，許多歷史系論述新聞史的著作中，總是將報紙當成史料著重在文本分析工作上。所以 Lucie 老師的這種看法，對我而言，乃是別開生面從未想過的。就這樣子我反而喜歡上一周一次北上，在黑牌研究室裡長夜苦思的研究工作。事實上，認識老師後，我對新聞史研究，在問題核心的設置，以及論述的內容上，大約是我成長最快的一段時間。

也就是這六年時間裡，我大量的參與了非歷史系的兩岸研討會，發表了六篇文章。在四川大學所發表的〈報業集團與媒體知識份子——以成舍我的《世界報系》為例〉一文（唐志宏，2008），回台後老師打了通電話，希望我弄個演講，上台和大家介紹一下。會後她問我中部的學校情況如何，到處奔波，學校有沒有意見？要不要先借調北上？我說和幾位老師想成立一個「媒體與文化研究室」，照常掛黑牌機關搞研究，以避免煩人的行政程序干擾。她聽了後很開心，說開幕時也要到中部參與，順便到日月潭去玩。我心想我們幾個毛頭小鬼老師要搞研究，老師竟然也要來參與，心裡有點不安，就往學校呈報，沒想到建國科大的副校長柯王副校長說歡迎 Lucie 老師前來，難得 Lucie 到中部一定要為我們做個演講。2008 年 4 月 10 日那天在圖書館裡，弄了場大圓桌會議，副校長、通識中心劉主任、圖書館甯館長坐在老師身旁，老師向我們大家談了她對科技大學開設人文型研究室的想法。與會有各科的老師，其中理工科老師占了半數，實在出乎我和明哲的意料之外。

會後進行完畢，明哲因有要事先行北返，4月11-12日二天，我開著車帶了 Lucie 老師和她的隨身看護阿英，去了趟日月潭旅遊。老師問我中部研究室想要做什麼？我說先帶老師們看書，開讀書會，談想法，再寫論文。她問我有沒有想要兩校合作，再搞大一點的研討會，我向她坦白地說科大的老師們因為環境的關係，研究方面要進行可能需要點時間。老師說沒問題，中部要什麼幫忙都要說，就這樣她爲了我方便北上，就簽了幾回的產學合作案，出版了《成舍我先生文集（台灣篇）》一書（唐志宏編，2007）；並且希望我借調到世新幾年，專心從事研究工作，因為受限於許多學校行政的程序，還有家庭因素，我一直都未答應老師。

去年12月時，我正在紀念館的研討室修習日文時，Lucie 老師特別叫我進她辦公室，又重提到台北從事研究一事。說她想要替她父親寫傳記，問我有沒有想法，有沒有方法能專心到台北從事研究。我就說應先出年譜、文集再來寫傳記，然後組織個學會有個對口單位和中國新聞史學會往來。老師說先想傳記的事，其它都應要做，但是放後面來考慮。傳記列爲首要，主因是顧及到大陸方面可能有人會將她父親傳記先行出版，如果文集和年譜先行出版，怕解釋權旁落。我就向老師說，老師我台北買房了，將來要好好幫老師弄研究工作，老師不用擔心，老師笑的很開心，還說我終於想通了。沒想到我遲來的允諾，但老師卻不在了，這可能會是我一生最大遺憾。

如果要回顧中國新聞史研究上，給我啓蒙最多的師長裡，有那些人對我影響深遠，大致有三位師長：一位是中央研院張玉法院士；一位是政治大學歷史研究所的林能士教授；一位就是 Lucie 老師。張老師教會我如何甄別史料、應用史料；林老師除了學術上的提攜、教我更多爲人之道；Lucie 老師則是對純歷史領域的新聞史研究，教我用突破的方式，用更寬廣的視野，去看待史料背後所延伸的問題。

事實上，追隨 Lucie 老師的腳步是十分辛苦的，她是個重視積累研究經驗勝於立即呈現結果的人，有時她甚至認爲過程的闡釋重於成果的呈現。在老師的想法裡，認爲研究過程是塑造年青學者人格特質，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勇於承擔的個性特質一旦確立了，那麼多艱難的研究工作，必能迎刃而解。所以，在塑造這種過程當中，她身先士

卒形塑這個典範。她可以比自己的學生還用功，總說一天睡三小時，開大小會十幾場，你們年青人不能喊累；他提問題不一定給解答，有時我們覺得一篇自認為很高明的文章，在他的提問下，變得問題重重；她甚至不太稱讚你用心的成果，但也不會刻意打壓你的信心，只是會淡淡微笑：「再想想，怎會那樣子？我覺得還可以更好」。所以，有時我們的文章寫好，都是擱置一段時間，修改到她說要不要提出來討論一下，才逕行發表的。

就這樣子和明哲許多躁進的想法，老師總是以「磨」的方式，讓我們慢慢去體會事情推展的關鍵點在那裡，然後再付之實行。從黑牌研究室到舍我紀念館、一直到新聞史研究中心的正式掛牌，其實就是一種老師「磨」的過程，所逐步建構出來的成果。

今天 Lucie 老師不在了。日升月落、人事轉移。雖然老師已離開了我們這研究行列，我和我的朋友們，縱各天涯各自忙碌於教研工作上，卻心志一致，無論多麼艱難，對 Lucie 老師理念的彰顯，不會只是建築在一時悲痛的熱情之上，而是會真正去實踐並延續她生前的幾項遺志：成舍我先生的文集、年譜、傳記的出版，以及研究學會的組建工作。雖然艱難，不知何時才能完成，但是我們會堅定的走下去。因為，我們與 Lucie 老師的結緣，正是從艱難處開始，又即將從艱難處重新出發。老師你放心，一路好走。

參、成舍我紀念館網站與新聞史的想像（李明哲撰）

約莫是 2004 年春天，修習 Lucie 課程之際，筆者興起了找 Lucie 當指導老師的想法。對一位從歷史學門轉到傳播學門的人而言，當時的念頭是「她應是一位可以接受歷史寫作方式的老師」。3、4 月的世新，山坡櫻花初綻，就在山洞口通往校內路上，翠谷餐廳邊旁，趕上了下課時正走向辦公室的 Lucie。我怯生生地提起請 Lucie 當指導老師之事，沒想到 Lucie 一抹慧黠的微笑說道：還好，你沒去找別人。一抹微笑開啓了之後新聞史研究上的因緣，往後我們師生論學衡文、辨章學術之間，那慧黠的笑一直是 Lucie 的感召力。

某種因緣際會，Lucie 提起要為成舍我先生蓋個紀念館網站。筆者因以往職場有相關工作經驗就接下了這任務。在討論網站的過程中，深感 Lucie 對網站的想法含蓋了對中國新聞史研究的更大視野，於是便邀請在歷史所時認識的同學唐志宏共同來參與。筆者的歷史領域是宋史，雖也對近、現代史略懂皮毛，但畢竟不夠熟稔。研究中國新聞史，沒有深厚的中國近、現代史底蘊，是無法完善解讀浩瀚的史料內容。志宏專攻近現代史，恰好補足這一缺憾。就這樣，三人有了一段「檯面下」的工作際遇。那時紀念館尚未成立，我們三人共同將那一個位於傳院地下室的小小房間，號稱為「中國新聞史研究室」。既是號稱，就不是正式機構，在這個「黑機關」裡，一方面蓋網站，一方面討論什麼樣的內容要放進網站。某次老師興沖沖的跑來說：「牟校長很滿意我們的網站」，又是那一抹慧黠微笑迴盪在彼此喜悅裡。在頻繁的討論中，於老師的指導下，也就興起了成立舍我紀念館與新聞史研究中心的想法。

在老師不辭辛勞的奔波之下，紀念館成立了。我們和老師關注的方向，也轉往如何研究「成舍我在新聞史的歷史定位」這一大課題。中國新聞史上有名的報刊和報人不勝枚舉，因此在這林立的報刊與報人裡，成舍我先生要用何種角度的研究才能勾勒出其報人、報業的特色，是老師所設定議題及關切的方向。老師也很不滿意對新聞史、報刊、報人研究往往是和政治發展掛在一起談，僅是詮釋政治史的一種附加史料而已，或是以序列排比報刊的編年研究方式，單一的呈現文本，忘卻了報刊背後所隱示的社會文化意義。這正是老師與海外學者於 2005 年在 Harvard University 所舉辦的 workshop 之主題：“Studying the Daily Medium: Newspapers as Subject and Source in Republican-era China, 1911-1949”。延續這一思路，在老師的指導下，要為成舍我定位首先要打破「新聞史只是政治史的史料」解釋這一傳統的研究路數。在這大方向下，在 2006 年為慶祝世新大學建校五十週年於學校召開的「民初報刊研究」第二場學術研討會，接續著上次 Workshop 方向，研討會的主題訂為：「文本與媒介：民初報刊的研究取徑，1911-1949」。為了此次研討會，志宏主編的《成舍我先生文集——港台篇 1951-1991》先行付梓出版（唐志宏編，2007）。我們三人則合寫〈弦

外之音：新聞產製流程與中國史學初探〉一文參與此會（李明哲、成露茜、唐志宏，2007）。

此文嘗試探討報紙不只是史料，同時也是文化機構下的產物，可以有更多視角來看待及研究。從現在的角度而言，這篇文章實屬實驗性的作品。但令人感恩及敬仰的是 Lucie 愛護後輩之情，願意借用其學術光芒來照亮後生晚輩，與我們共列作者，並讓「字數寫得最多」的筆者掛名第一作者。正是這種盛德與大量，讓我們無怨無悔的追隨著 Lucie。

延續著報刊不僅是史料呈現的方向，我們確立了研究成舍我的主軸。在老師的指導之下，逐漸構思出以「新聞典範」的視野下，從報業經營管理、新聞教育建置、媒體知識分子群體、大眾化報刊等這些歷史橫切面，來交會出成舍我先生在新聞史的歷史定位。方向確定後，在老師指導之下一些作品就逐漸的寫出，唐志宏（2008，2009）陸續於大陸新聞史研討會發表了〈報業集團與媒體知識份子——以成舍我的《世界報系》為例〉、〈報刊實踐意識的轉移：媒介知識分子的形構——以成舍我大眾化報業框架建構為例〉等六篇文章。同時志宏也於 2007 年 6 月 15 日於舍我紀念館發表研究成果的專題演講：〈報業集團與媒體知識份子——以成舍我「世界報系」為例〉。當觀念逐漸釐清之際，在老師的指導及建議之下，有了申請國科會整合型計畫的構想。這一整合計畫在向國科會申請之前，老師提議於 2008 年 12 月 19 日先行在舍我紀念館進行專題報告：〈兩岸成舍我研究現況與我們的整合性研究計畫〉；老師依舊以愛護後輩的方式，要我與志宏同列主講人。而在過程中，我們又找了 2008 年 11 月 21 日曾於紀念館報告「二二八事件新聞史研究」、口語傳播學系的夏春祥一齊加入；最後在老師主持下，我們四人聯合申請國科會的整合計劃案，老師與志宏的子計畫通過了，但整合案並沒通過，我個人的不才造成整合案的流產，至今讓我仍深深愧對 Lucie。但老師依然如往常對我一抹慧黠微笑。

在國科會結果揭曉前，老師先行前往 Berkeley 參與 2009 年 4 月 17-18 日舉行的 the Third Workshop on Newspapers as Source and Subject。在問學討論之際，深覺需要有一個可以整合上述歷史橫切面的思想體系來定位成舍我。無政府主義與成舍我的關係在老師提

示之下就浮現了出來，並成爲老師參與這次 workshop 的題目“Fei Zibenzhuyi dazhonghua baokan: Cheng Shewo and Chinese Anarchism”（Cheng, Tang, & Lee, 2009）。同樣地，老師依舊以提攜後進的方式，我與志宏又添列爲共同作者。會後返台，老師一直掛念著要我們將此文修改爲中文，並投稿到《新聞學研究》與學術圈先進們共同分享初步成果。作者不才，此一老師心願直到 2010 年 1 月 10 日才修稿完，理應先寄給老師審閱，但此文初稿老師已看過，同時傳來老師小病住院的訊息。爲避免打擾老師，我擅自主張的先行投稿，一併也將投稿文寄給老師。沒想到老師頃刻即予以回覆，對稿件中的脫字、錯字早已細校完畢，並約好今年 1 月 15 日要再開會討論。然而，此一會議老師永遠爽約了。

《論語·學而》：「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老師啊！在您身體還健朗之時，我們還討論了至少有七、八個新聞史題目要寫、要投，這些我們都會盡全力完成。同時，從架設網站時期您就一直念茲在茲的成舍我先生文集、年譜及傳記，現在已是「正在進行式」。《莊子·大宗師》：「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斯人也！吾其斯人之徒呼？

註釋

- [1] 請參閱《「再見，Lucie」追思會手冊》，2010 年 2 月 27 日，20 頁，以及趙萬來（2010）。〈永悼六八年世代在台唯一一人〉，《傳記文學》，575：272。
- [2] 這個敘述並不完整，因爲當時也有很多可歸屬於傳播產業史的研究作品，例如：程宗明（1998）。〈台灣戰後廣播工業的控制與依附研究（1947-1961）——抑制需求面與管制生產面的收音機產業〉，《傳播論文選集 1997》，319-370，台北市：中華傳播學會。只是，從報業角度出發的新聞史研究的確屈指可數，例如：林富美（1998）《臺灣政經系絡中的報業發展：以聯合報爲例，探討媒介雙元特質對報業組織作爲的影響》，台北市：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博士論文。

- 〔3〕在這一期刊中，包括的文章有陳世敏（2001）〈台灣傳播史的研究與書寫〉、林麗雲〈新聞傳播史觀初探〉、夏春祥〈新聞與舊聞〉，以及劉慧雯〈與後現代對話：一個有關史料邏輯與書寫策略的想像〉等。
- 〔4〕在中國國民黨或中國共產黨各自統治的地區裡，相關研究對不同陣營的各類報紙根本上是隻字不提，那怕他們確實有著社會影響。
- 〔5〕關於社會文化史的更多討論，請參閱夏春祥（2010）關於新聞與記憶的討論。
- 〔6〕國際媒體與傳播研究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AMCR）是國際性的傳播研究專業組織，成立於1957年，擁有來自7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數千名會員，成員除英、美、法、德等國家外，還包含更多的第三世界的會員。學會原訂於2003年7月14-16日在台北舉辦年會，後來因為SARS而展延至2005年，當時的主題為「媒介慌張：全球化時代中的自由、控制與民主」（Media panics: Freedom, Control and Democracy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企圖回應當時全球上的幾件大事，如美國的九一一恐怖攻擊、伊拉克戰爭事件、肆虐亞洲的禽流感、SARS、南亞大海嘯等。
- 〔7〕這篇專題演說文章的題目是「當代美國媒體與民主危機」，翻譯是由台灣大學城鄉所的王志弘負責，當時他任教於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

參考書目

- 世新大學（2010.02.27）。《「再見，Lucie」追思會手冊》，20。
- 李明哲、成露茜、唐志宏（2007）。〈弦外之音：新聞產製流程與中國史學初探〉，「文本與媒介：民初報刊的研究取徑，1911-1949 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台灣，台北市。
- 林富美（1998）。《臺灣政經系絡中的報業發展：以聯合報為例，探討媒介雙元特質對報業組織作為的影響》。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博士論文。
- 林麗雲（1999.10）。〈台灣威權政體下「侍從報業」的矛盾與轉型：1949-1999〉，《新聞報業如何再現事實？語言層面的探討》論文發表會。台灣，台北市。
- 林麗雲（2001）。〈卻顧新聞所來徑，一片滄桑橫脆危——台灣的新聞史研究之回顧與前瞻〉，《2000 傳播論文選集》，台北市：中華傳播學會。
- 林麗雲（2003）。〈做而言，起而行：「無盟」的實踐〉，《台灣社會研究季刊》，50：37-66。
- 林麗雲（2004）。《台灣傳播研究史——學院內的傳播學知識生產》，高雄市：巨流。
- 唐志宏（2008）。〈報業集團與媒體知識份子——以成舍我的《世界報系》為例〉，《世界華人傳播學學術研討會：中國西部與全球化論文集》，頁 245-265。成都：四川大學文學與傳播學院。
- 唐志宏（2009.07）。〈報刊實踐意識的轉移：媒介知識分子的形構——以成舍我大眾化報業框架建構為例〉，「中國新聞史學會 2009 年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中國，南京。
- 唐志宏編（2007）。《成舍我先生文集：港台篇 1951-1991》。台北市：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暨新聞史研究中心。
- 夏春祥（1995.07）。〈論社會科學與歷史意識——以傳播研究為例〉，「第二屆傳播生態研討會」論文。台灣，新竹市。
- 夏春祥（1998）。〈什麼是傳播思想史——談傳播研究中的歷史問題〉，《傳播研究簡訊》，12：8-9。

- 夏春祥 (2007)。〈在傳播的迷霧中——二二八事件的媒體印象與社會記憶〉，台北市：韋伯文化。
- 夏春祥 (2010)。〈新聞與記憶：傳播史研究的文化取徑〉，盧建榮 (編) 《社會／文化史集刊 (3)》，頁 81-100，台北市：時英。
- 陳平原 (1998)。〈輿論家的態度與修養——作為北大學生的成舍我〉，中國人民大學港澳台新聞研究所 (編) 《報海生涯——成舍我百年誕辰紀念文集》，頁 96。北京：新華。
- 彭家發 (1995)。〈大陸中國新聞史研究著作總覽及評估 (1949-1994)〉，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 程宗明 (1998)。〈台灣戰後廣播工業的控制與依附研究 (1947-1961)——抑制需求面與管制生產面的收音機產業〉，中華傳播學會 (編) 《傳播論文選集 1997》，頁 319-370。台北市：中華傳播學會。
- 潘家慶 (1997)。〈第一等大事，豈可等閒視之〉，《傳播研究簡訊》，10：1-3。
- 趙萬來 (2010)。〈永悼六八年世代在台唯一一人〉，《傳記文學》，575：272。
- 鄭舒蘭 (2010)。〈真正的女鬥士——記成露茜博士對美國華裔歷史研究的貢獻〉，《傳記文學》，96 (4)：204-205。
- Cheng, L., Tang, C., & Lee, M. (2009.04). *Fei Zibenzhuyi dazhonghua baokan: Cheng Shewo and Chinese Anarchism*.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hird Workshop on Newspapers as Source and Subject (Republican Era Newspapers: The Journalistic and the Literary),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Berkeley.

Notes on Lucie Cheng's (1939-2010) Research of Chinese Journalism History

Chun-Hsiang Hsia, Chih-Hung Tong, & Ming-Che Lee*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research performed by Lucie Cheng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journalism. This researcher's work is generally understood as a gift from her father, Cheng She-Wo.

Ms. Cheng has extended the work of her father with her own vision, which is insightful and ambitious. This article examines her projects and work at different institutes such as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Her efforts focus on the significance of cultural history to the history of journalism. Ms. Cheng treats journalistic activity as the subject of research rather than a source of data and information.

Keywords: Lucie Cheng, Chinese journalism history, She-Wo Cheng, Shih Hsin University, Cheng She-Wo Institute for Chinese Journalism, new cultural history

*Chun-Hsiang Hsia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Speech Communication,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Chih-Hung Tong is Lecturer at the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Chienkuo Technology University, Changhua, Taiwan. Ming-Che Lee is Assistant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Shih Hsi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